

中国近代史丛书

甲午中日战争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037 8622 4

中国近代史丛书

甲午中日战争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丛书》

甲午中日战争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625 字数 50,000

1973年1月第1版 197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0

统一书号：11171·30 定价：0.14元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编写说明

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学点历史的需要，我们编写这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介绍些近代史的基本知识，以供阅读参考。

这套丛书，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以及若干近代历史人物，陆续出书。每本约四万到六万字。

我们这个编写组，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同志组成的。我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有限，编写出来的东西很粗糙，甚至可能存在错误，热忱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目 录

- 一、甲午战争前的形势····· 1
- 二、日本侵略者的对外扩张····· 6
- 三、为发动侵略战争制造衅端·····12
- 四、不宣而战·····21
- 五、平壤撤退与黄海海战·····25
- 六、战火烧到中国境内·····34
- 七、清军的全面溃败·····40
- 八、东北人民的英勇抗战·····49
- 九、《马关条约》·····52
- 十、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61
- 十一、中国人民反对割让台湾的斗争·····68

一、甲午战争前的形势

甲午中日战争，是一八九四年(旧历甲午年)日本为侵略中国和朝鲜而发动的侵略战争。它是日本统治者推行扩张政策、蓄谋侵略中国的必然步骤。

日本原来是一个封建领主割据的、闭关自守的国家。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美、俄、英、法、荷等资本主义列强，先后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打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

一八六八年，新兴的日本资产阶级，联合一批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方军阀，发动了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明治维新，建立起以明治天皇为头子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从此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日本的资本主义，带有浓厚的封建性。明治维新以后，地主对佃农的封建剥削关系，仍然严重地保留着；资产阶级残酷地实行包身工制度、惩罚制度，利用封建关系加强对工人的压榨。日本资本主义的这种封建性，使日本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生活极端贫困，购买力低下，国内市场狭小。同时，也由于农业中保留着封建关系，生产发展受到阻碍，粮食、棉花的生产远远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需要。再加上广大工人、农

民为了反对资本家和地主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不断举行罢工和起义，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因此，日本统治者迫不及待地想从对外扩张侵略中寻找出路。

明治政权一建立，就确立了以“武国”和扩张为最高国策。一八六九年三月十五日，明治天皇发布一道“宣布国威的御笔信”，叫嚣要“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所谓“开拓万里波涛”，它的侵略矛头，首先是指向中国和朝鲜。因为在日本侵略者看来，中国是一个邻近的、最大的掠夺对象；而朝鲜盛产大米、大豆、黄金，和其他矿产资源，又与中国毗(音皮 pī)连，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因此，他们叫喊：夺取朝鲜，“实为皇国保全之基础，未来经营万国、谋求进取之基地。”但是，日本侵略者也深知，侵略朝鲜，不仅要受到朝鲜人民的誓死抵抗，而且也会遭到同朝鲜人民有共同命运、有唇齿关系的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因此，要实现这一侵略目标，就必须加紧充实军事侵略力量。

正是因为要侵略中国和朝鲜，同时也为了镇压国内广大工人、农民的反抗，明治政权建立后，日本统治者就认为：“国之兴废，在于兵力。”提议用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扩充军备，全力建立和发展近代化的海陆军。磨刀霍霍，加紧准备，伺机发动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

正当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加紧准备对中、朝两国进行侵略的时候，中国和朝鲜却日益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就企图侵入朝鲜。一八六六年，法、美侵略者先后派遣舰队袭

击江华岛与平壤地区，为英勇的朝鲜军民所击退。一八七一年，美国侵略者又对朝鲜进行一次新的军事冒险，依然未能得逞。从此，美国侵略者就采取通过日本侵略朝鲜的政策。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列强为争夺朝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日本是急先锋。但是，它那时还羽毛未丰，侵略活动是在美国支持下进行的。

美国是日本侵略朝鲜的鼓动者和支持者。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美国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它的工业生产，在一八九〇年已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占世界第一位。美国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是它世界扩张政策的基础。但是，当美国资本主义急剧发展的时候，美洲、非洲差不多已被西方列强分割完了，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斗争，已集中到亚洲东部地区的中国和朝鲜一带。美帝国主义所向往的，首先是建立“太平洋帝国”，从夺取太平洋霸权，到夺取世界霸权。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弗·尔·杜勒斯，在他所著《美国在太平洋》一书中说：“全部美国历史，都贯串着争取太平洋霸权及控制其商业财富的野心。”可是，直到一八九九年美国夺取菲律宾之前，它在远东却缺少一个有力的基地，美国海军要跨越太平洋作战，将遇到极大的困难，美国当时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因此，它就采取了通过日本进行侵略的政策，利用日本为美国的资本和政治势力侵入中国和朝鲜开辟道路。而当时日本在政治与经济上，也需要美国的支持。这样，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问题上，就形成了美、日两国之间的相互利用。

沙皇俄国是当时日本北进侵略政策的主要对头。自从十

九世纪中叶，沙俄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之后，就进一步力图在远东取得一个不冻的港口，进而把中国东北和朝鲜，变为它的势力范围。沙俄完全了解朝鲜在战略上的意义，因此也把它的侵略魔爪伸进朝鲜，和其他列强钩心斗角。沙俄在它的西伯利亚铁路建成以前，力图从政治上控制朝鲜，阻止朝鲜为日本所侵占。

英国在远东政策的基本点，是所谓“维持现状”，也就是维持英国在东方的优势地位。因为英国在东方有广大的殖民地，在中国也攫获了广泛的权益，并力图把长江流域和华南变成它独占的势力范围。它不希望这一地区有新的竞争者，危害到自己的侵略利益。从这一角度出发，英国对日本的侵略活动，是有戒心的，不希望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但是，由于英、俄矛盾，英国又害怕沙俄夺取朝鲜，建立军港，南下与它争衡。因此，它又愿意支持日本来箝制沙俄。甲午战争以前，英国对朝鲜的政策是维持现状，使朝鲜处于有利于英国的形势下。甲午战争爆发后，在清朝军队节节败退、日本侵略势力急剧增长的形势下，英国则转向支持日本，力图使日本在远东阻挡沙俄势力南下。

面对着国内危机与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紧张局面，朝鲜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的利益，除对内残酷镇压外，对外先是采取严厉的闭关政策，八十年代前后，在掌握清朝政府外交大权的李鸿章的怂恿下，又和资本主义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企图利用列强的矛盾，来抵挡日本侵略，借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显然，这样的政策，并不能

使朝鲜人民免于遭受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和奴役。

中、朝两国都开始日益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情况,无疑大大便利了新兴的日本侵略者的侵略。

二、日本侵略者的对外扩张

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者确定了侵略朝鲜，并以它为基地，进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一八七〇年，明治政府成立后的第三年，日本统治者之间，就爆发了一场关于征服朝鲜问题的激烈争论。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日本军阀，主张立即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资产阶级的代表，则以准备不充分、时机未成熟为理由，反对立即出兵。最后经天皇裁决，暂时采取加紧军事准备，而以发动外交攻势为主的侵略政策。

日本侵略者在准备侵略朝鲜的同时，也开始向南扩张，一八七二年擅自宣布琉球为日本的“内藩”。一八七四年，日本政府以过去曾有琉球船遭风飘流到台湾，被台湾居民“劫杀”数十人为借口，悍然出动陆海军三千余人，由西乡等侵略分子率领，乘美国船“纽约”号，在原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指引下，侵入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企图加以占领。入侵者遭到台湾人民的英勇抵抗，死伤数百人，清朝政府的军队又相继到达，兵力远胜于日军。但是，英、美侵略者却以“调停”的名义，诱迫清朝政府与日本订立《北京专约》，条约中有日本出兵是

“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为不是”等语句，事实上承认琉球是日本的属国，又给了五十万两赔款，作为日本撤兵条件。日本企图武力侵占台湾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不久却吞并了琉球。

日本吞并琉球，是它在近代史上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步骤，鼓舞了它进一步侵略朝鲜和中国的野心。

接着，日本侵略者就把魔爪伸进了朝鲜。一八七六年，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了不少特权。如开仁川、元山为通商口岸，日本商人的商品得免纳关税，日本纸币得在朝鲜市场上流通，日本的船只可以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测量，以及领事裁判权等等。从此，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就逐渐侵入朝鲜。

中国和朝鲜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中、朝两国人民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中、朝两国人民曾多次并肩作战。如十六世纪末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派军队侵略朝鲜的过程中，李如松就曾率领中国明朝军队，和李舜臣率领下的朝鲜军队一起，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中、朝两国相继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对象，中、朝两国人民更是同呼吸、共患难的兄弟。

可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向朝鲜入侵的时候，统治中国的腐朽的清朝政府，并不能帮助朝鲜抵抗日本侵略者。当日本胁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时，李鸿章不但不向日本提出抗议，反而密劝朝鲜政府“用以敌制敌之策，与泰西

各国订约，借以牵制日本。”诱使朝鲜政府相继与美、英、德、俄、法等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企图利用列强相互间的矛盾，保持朝鲜局面的“稳定”。这是出卖朝鲜的严重罪行。

一八七六年《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侵略势力从各方面向朝鲜渗透。在政治上，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地扩充自己的侵略势力。在经济上，大批想发横财的日本商人和投机家，纷纷奔向朝鲜，在开放的港口强占最好的地段，并深入农村，用欺骗和放高利贷的办法，残酷剥削朝鲜农民、小商人和城市贫民，为非作歹，欺压群众。他们还力图从思想上奴化朝鲜人民，创办报纸，开办学校，派遣大批“和尚”，以种种借口，潜入朝鲜各地，蛊惑人心。他们更以帮助朝鲜“改组”军队为名，派遣军官打入朝鲜军队，企图加以控制。

日本侵略者的猖狂活动，遭到朝鲜人民的坚决反对。一八七九年四月，釜山附近发生了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暴力行动。同时，朝鲜人民反对朝鲜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也明显地带上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性质。

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汉城的朝鲜军队发生兵变，打死克扣稻米的官吏。朝鲜政府逮捕肇事者，引起了军队和城市贫民的起义。起义很快发展成为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起义者放火烧毁汉城日本公使馆，迫使侵略者狼狈逃往仁川。

日本侵略者利用这一事件，派遣军队去朝鲜，以战争相威胁。这时由于清朝政府也派了军队到朝鲜，日本侵略者未敢轻举妄动，但却胁迫朝鲜签订《仁川条约》，取得在汉城驻扎军

队的特权。从此日本侵略势力在朝鲜进一步增长。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初，朝鲜“开化党”发动政变，历史上称为“甲申政变”。朝鲜国王在清朝军队的帮助下，镇压了政变。日本乘机对清朝政府进行要挟。第二年，清朝政府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议定：一、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二、朝鲜练兵，两国均不派教官；三、将来朝鲜如果发生变乱或重大事件，两国如要派兵，须行通知。这个条约肯定了日本有权向朝鲜派兵，是李鸿章对朝鲜人民利益的又一次可耻出卖。

日本侵略者一面积极向朝鲜伸张侵略势力，一面加紧扩军备战。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签订后两年，一八八七年日本参谋部就拟定了一份《征讨清国策》。计划在侵略战争发动后，日军以大部分兵力进攻北京，以部分兵力占领长江流域的战略要地，阻止江南清军北上，配合对北京的进攻。日本侵略者还妄想战后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辽宁省盖平县以南地区、山东登州府（山东半岛）、舟山群岛、台湾、澎湖列岛和长江两岸十里左右之地，划归日本版图；同时将中国其余地方，分割为东北、江南、华北、青藏、内外蒙、甘肃、准噶尔等几个小国，分别附属于日本。这份计划还规定，“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发动进攻。”

日本加紧扩军备战，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日本国内阶级矛盾随之激化。同时，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与国内市场狭小、资源不足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一八九〇年，日本主要的工业部门棉纺织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大批中、小工厂破

产,许多县市发生抢米暴动。在日本统治者看来,要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步伐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

为了制造对外扩张的理由,日本军阀头子、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一八九〇年发表“施政演说”,抛出了“保护利益线”的侵略理论。他叫嚣什么日本的“国家独立自卫之道,其途有二:第一,守卫主权线;第二,保护利益线。主权线,指国之疆域;利益线,指与主权线的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这就是说,只要日本侵略者宣布,某一国家、某一地区与它的“利益”有关,就可以在“保护利益线”的名义下,任意加以侵犯和占领。这是彻头彻尾的强盗逻辑!日本军国主义正是利用这套强盗逻辑,把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台湾,都说成是在日本“利益线”的范围内,是所谓日本的“生命线”,在国内大肆煽动战争狂热。

接着,日本外务相大木在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对议会的演说中,公开宣称要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他说:“为什么日本人民不多考虑一些帝国的对外政策呢?如果你们回溯你们国家的历史到足利时代,你们就会看到日本南部的人们——其中有一些也许可以称作海盗——剽(音票 piào)掠拥有几万万人口的中国的沿海,往来自如,任情取舍。这样一种人的后代,竟把他们的理想完全局限在‘修改条约’(指当时日本要求修改与欧、美各国之间签订的条约)这四个字上,未免太不足取了。”这是他们侵略野心的大暴露!

日本统治者之所以如此公开叫嚣战争,是与他们认为日

本的军事力量这时已可以发动一次大规模侵略战争有关。一八九二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一八八五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据一八九三年统计：日本陆军平时兵力六万三千余人，战时可达二十三万人（包括十余万人的后备队），海军拥有的军舰，排水量达六万余吨。为了进一步做好随时发动战争的准备，日本侵略者于一八九〇年和一八九二年，先后举行两次大规模陆海军联合演习。一八九三年五月，决定成立战时大本营，负责筹划和指挥日本侵略军作战。日本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又溜到朝鲜的釜山、仁川和中国的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各军事要地，察看地形，搜集情报，做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充分准备。还早在战争发生之前，便已绘成了包括朝鲜、中国的东北和渤海湾在内的详细的军用地形图。一个名叫波尔纳的欧洲人，曾获得这样一份地图，他后来十分肯定地指出：“这份地图本身就是日本久已蓄意侵略中国的证据，它驳斥了日本当时（指甲午战争时期）是被迫作战的说法。相反地，那是一次有意图的、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

日本侵略者已经准备就绪，跃跃欲试，伺机挑起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

三、为发动侵略战争制造衅端

一八八四年以后，日本侵略者更加千方百计地把朝鲜的经济置于自己支配之下。九十年代初，日本侵略者几乎垄断了朝鲜的对外贸易。一八九一年，在朝鲜的外国商行共一百八十四家，其中一百六十九家属于日商。一八九二年，开入朝鲜各港口的全部船只的容量是三十九万吨，其中日本船只占三十二万六千吨。这一年，在朝鲜对外贸易额七百万元中，日本占了四百八十万元。

日本侵略者不仅通过垄断朝鲜对外贸易，来剥削朝鲜人民，而且还利用朝鲜人民的贫困，深入农村用放高利贷的办法，直接对朝鲜人民实行敲骨吸髓的盘剥。日本商人常常在播种之前，走遍朝鲜农村，趁朝鲜农民困难，以极小的贷款，获得将来按最低价格收购农产品的权利。这样，朝鲜农民就陷入了对日本侵略者债务依赖的境地，并在下一年也不得不把青苗预售给同一个日本商人。一八八九年，朝鲜北方各道发生严重饥荒，咸镜道的所有青苗，竟然全部卖给了日本商人。这种情况说明，日本侵略者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怎样严重的灾难！

同时，外国商品的大量出现在朝鲜市场，地主和官僚的需

求增加了。腐败的朝鲜统治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就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使广大人民群众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当时朝鲜民间流传的歌谣：“金樽（音尊 zūn）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正反映了这种情况。

勤劳勇敢的朝鲜人民，反对腐朽的朝鲜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八十年代以来不断发展。杀死地主、官僚以及日本侵略分子的事件不断发生，到一八九四年终于爆发了东学党领导下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东学党的名称，是由东学道而来。东学的意思，就是“东方之学”，是和西方的基督教直接相对立的。他们组织农民群众，提出“除暴救民”、“逐灭洋倭”等口号，展开了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特别是日本侵略者的斗争。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各地群众纷纷响应，朝鲜南部的全罗、忠清、庆尚三道，很快地为全臻（bēng崩上）準领导下的农民起义军所控制。全罗道的首府全州，也为起义军攻占，农民战争的烈火，炽热地燃烧起来。

当时，日本侵略者阴谋借朝鲜农民起义的时机，来挑起战争。早在四月上旬，川上操六就派军官多人，去朝鲜活动。五月二十七日，川上和日本浪人组织“玄洋社”的头子平冈浩太郎秘密商定，一方面由玄洋社浪人组成“天佑侠”，以“帮助”东学党作战为名，妄图转移东学党“逐灭洋倭”的斗争方向；一面竭力怂恿清朝政府出兵朝鲜，镇压农民起义，为自己出兵朝鲜制造借口，以便把清朝政府拖入预设的战争陷阱。六月二日，日本驻朝鲜公使杉村濤，派译员向清朝政府驻朝鲜通商事宜

大臣袁世凯表示，如果清朝政府出兵帮助朝鲜政府镇压起义，日本政府“必无他意”。第二天，杉村又亲自去找袁世凯，表示希望清朝政府能够出兵帮助朝鲜政府，镇压农民起义。

袁世凯是个善于窃取权力的家伙，他从敌视朝鲜人民的反动立场出发，希望清朝政府派兵镇压朝鲜人民起义，并借此抬高他个人的权位。他在得到朝鲜政府请清朝政府派兵镇压东学党起义的要求后，连打急电催李鸿章出兵。并说杉村是他的老朋友，日本政府重在保护商民，“似无他意”。

在袁世凯的怂恿下，李鸿章对日本的保证深信不疑，六月四日应朝鲜政府请求，派淮军将领、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部二千余人，乘船在朝鲜牙山登陆。接着，李鸿章于六月七日根据一八八五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规定，通知日本政府。这样，清朝统治者就上了日本侵略者的圈套。

日本侵略者玩弄外交阴谋，早在六月二日当它得知朝鲜政府已决定要求清朝政府出兵的当天，就决定派兵入侵朝鲜。为了军事上的先着，它不等待清朝政府出兵的通知，就以护送驻朝鲜公使大鸟圭（音归 gui）介返任和保护使馆、商民为名，派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作为先遣队，侵入汉城。六月五日成立大本营，动员七、八千人的兵力，继续出发，于六月十三日和十六日，先后在仁川登陆，分据汉城附近要地，人数远在清朝军队之上。这就是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所谓“在军事上一切皆欲先发制人”的手段。

但是，事实上当时汉城是平静的，日本使馆和侨民并没有受到威胁。日本设立大本营，动员海陆军，出动这么多兵力，



一八九四年六月，日本侵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

目的显然不是去保护什么使馆、侨民，而是要以武力侵占朝鲜，并进而侵略中国。正如后来陆奥宗光自己招供的，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的决心，在“(日本)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

日本侵略者在军事上作了部署后，便在外交上步步进逼寻衅。六月七日，日本政府接到中国出兵的照会后，立即通知清朝政府，表示它也将出兵朝鲜。李鸿章接到日本出兵的消息，大为慌张，急忙要求日本不要出兵过多，不要进入朝鲜内地。日本侵略者断然拒绝，并于六月十二日蛮横无理地照会清朝政府，说什么日本派军队去朝鲜，除依据天津条约行文通知外，至于派兵多少及进退行止，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为了进一步扩大事态，日本内阁更于六月十四日，通过所谓“朝鲜内

政改革案”。

六月十六日，陆奥正式向清朝驻日公使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建议。六月二十一日，清朝政府拒绝日本侵略者的无理建议，并提出双方应立即撤兵的主张。日本侵略者的目的原在挑衅，所以接到复文后，六月二十二日立即照会清朝政府，蛮横地声称日本决不撤兵。

面对日本不断增兵朝鲜，蓄意制造紧张局势，战机一触即发的形势，清朝政府内部分成了“主战”与“主和”两派。主战派以光绪帝和他的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音和 hé）为首，还有和他们亲近的朝臣，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右侍郎志锐等。这些人即所谓“帝党”。他们拥戴光绪帝，暗中和把持朝政大权的西太后的“后党”相对抗。在朝鲜问题上，帝党主战，是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后党、帝党在和战问题上的争斗，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帝、后两党争权的激化。帝党虽然主战，但对如何战胜日本，并无办法。他们主张“联英伐倭”，也不比李鸿章的“联俄拒日”好些。帝党原无实权，只能利用皇帝的“上谕”和朝野的舆论，督促李鸿章出战。而真正具有决定清朝政府对外政策权力的，还是后党。

后党中的李鸿章，是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起家的。他在勾结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得到了侵略者和清廷的“赏识”，掌握了一支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反革命武装——淮军，很快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宝座。他在对待外国侵略的问题上，一贯避战求和、屈膝投

降，口头上说为了保存实力，目的在于为他个人保持政治地位，为统治阶级保全镇压人民的力量。一八九四年正值西太后六十岁，这个反动阶级的头子大摆排场来庆祝自己的寿辰，不愿意对外发生战争，盼望对日问题从速和解了结。西太后的态度，使李鸿章更加有恃无恐地放手推行对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的政策。

因此，尽管当时国内舆论，和在朝鲜的清军将领，都要求清朝政府备战增援，阻止侵略，驱逐日本势力出朝鲜，但是李鸿章一概置之不理。而是先后寄希望于俄、英两国的“调停”，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在军事上根本不作认真的战备，消极等待，被动挨打。

当时，列强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利害关系最大的是俄、英两国。

日本的侵入朝鲜，和沙俄向太平洋扩张的政策，发生了尖锐的利害冲突。因此，李鸿章六月二十日请求沙俄驻北京公使喀西尼，电请沙皇政府出面“调停”，正合它的胃口。于是，沙皇政府令喀西尼与李鸿章面谈。喀西尼声言：“俄、韩近邻，断不容日妄行干预。”李鸿章得到喀西尼的口头保证后，便电令袁世凯、叶志超“镇静勿妄动”，说什么“我不先开仗”，要坚持“万国公理”，“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幻想沙俄进行有利于中国的调停。

六月二十五日、三十日，沙俄驻日本公使希特罗渥，先后两次向日本提出撤兵劝告，日本都婉辞拒绝，并向沙俄保证，绝不想占有朝鲜，等朝鲜“内乱完全消灭”，便把军队撤回。

沙俄虽感到日本发动战争对自己不利，但并不立即进行干涉。在一系列活动无效后，就停止调停，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

李鸿章看到依靠沙俄调停的希望快要破灭，又立即转向英国。他异想天开，要求英国派遣舰队到日本横滨，迫使日本撤兵。英国这时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十分矛盾。英国不愿意日本发动战争，损害到它在中国的侵略权益，特别是害怕沙俄乘机出兵干涉，扩张势力。就这点说，英国愿意出面“调停”。但是，由于英、俄存在矛盾，英国也可以支持日本发动战争，以此阻挡沙俄在远东的扩张。因此，英国希望在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沙俄的情况下，促成中、日谈判，维持“和平”局面。

这时，朝鲜已战云密布。英国继沙俄之后出面调停。英国驻北京公使欧格纳，向日本政府提出“整理朝鲜内政”和“同保该国土地勿令他人占据”，作为中、日谈判基础。李鸿章为了达到避战求和的目的，也就同意了这些条件。

然而，日本并不以这样的条件为满足，以各种借口拒绝英国调停，继续不断增兵。

英国看到日本决心发动战争，转而讨好日本。一八九四年七月十六日，英国与日本签订条约，宣布五年以后废除过去签订的不利于日本的英、日条约，以表示“友好”。七月二十三日，英国向日本提出，开战后不要侵犯英国在华利益中心的上海及其附近地区，日本立即答应了英国的要求。这样，英、日两国就取得了“谅解”。

日本侵略者利用俄、英“调停”的时机，从各方面加紧进行

挑起战争的准备。六月二十六日，日本公开向朝鲜政府提出所谓“改革”朝鲜内政的书面要求，接着又提出“改革”的具体纲领，详细规定了有关用人、行政、军事、币制等项“改革”。七月十日，更提出所谓“补充说明”数十条，向朝鲜政府勒索建筑铁路、架设电线等特权，并限三天内答复。朝鲜政府婉言拒绝。日本侵略者明知朝鲜不能接受，马上乘机翻脸。七月十七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竟然向朝鲜政府提出警告。七月十九日，大鸟接到要他不惜任何手段，立即挑起中、日军事冲突的密令。十九日及二十日，大鸟先后两次以最后通牒式的照会，要求朝鲜政府立即公开声明，断绝中、朝间的一切关系，并命令驻牙山的中国军队，从朝鲜撤退。最后通牒的期限是七月二十二日夜十二时。

日本侵略者显然是想一下子就把长期以来建立的中、朝关系割断，把朝鲜变成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这当然是朝鲜坚决反对的。

最后通牒在七月二十二日夜十二时没有得到答复。日本侵略军立即进攻朝鲜王宫，守卫宫廷的朝鲜部队对侵略军进行了抵抗。但是，怯懦的朝鲜国王耽心自己生命危险，命令警卫部队放下武器。

日本侵略军占领朝鲜王宫后，事前早已组织好的亲日傀儡政府，立即粉墨登场。日本侵略者为了遮掩它的丑行，诱胁国王的父亲大院君出来主持国事。在日本侵略者刺刀扶植下的朝鲜傀儡政府，按照日本的意图，于七月二十五日正式宣布与中国断绝关系，并给日本侵略军驱逐中国在朝鲜军队的

权力。

就在朝鲜傀儡政府“委任”日军驱逐中国军队的同一天，日本侵略者就不宣而战，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偷袭中国的军舰和运输船，揭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

四、不宣而战

在日本侵略者七月二十五日发动突然袭击的前夜，由于李鸿章一直推行妥协投降的政策，清朝政府在军事上早已陷入不利的被动地位。自从六月初日军入据汉城以后，应朝鲜政府的要求，被派往朝鲜镇压东学党的清军叶志超部，就开始受到日军的威胁。其后，日本侵略军不断增兵，占领了汉城以南的战略要地，和仁川、釜山等重要海港，在战略上“已占先着”，居主动地位。而李鸿章在大批日军入侵朝鲜的面前，却吓破了胆。李鸿章认为，日军据汉城，已占先着，如“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他还认为，叶志超部有兵二千五百人，已可以自卫，如果“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因此，他既不派兵增援，也不作任何积极布置，结果使叶志超的军队，日益陷入被围的危境。

到七月中旬，汉城一带的日本侵略军，已近三万人。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形势愈来愈紧张。李鸿章在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下，才不能不有所动作。他一面派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伸阿等统军，从辽东渡鸭绿江进军平壤；一面又打算派两千，渡海增援牙山的驻军。买办官僚李鸿章，十分迷信和

崇拜洋人，他雇用了三只英国商船，从七月二十一日起，分两批运送这两千人的增援部队。但是，当这支增援部队刚运了一半，从陆上进军平壤的军队才渡过鸭绿江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就不宣而战了。

在七月二十三日日军侵入朝鲜王宫的同一天，日本联合舰队的头子伊东祐亨，已接到大本营的作战密令，率军舰十五艘向朝鲜海岸进发。二十四日伊东祐亨派日舰“吉野”号、“浪速”号、“秋津洲”号开赴牙山湾，阴谋中途拦击从海上增援牙山的清军。二十五日晨，中国军舰“济远”号、“广乙”号由牙山回驶天津，行抵牙山口外丰岛附近，突然遭到日舰袭击。日舰“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在他日记中写道：七月二十五日，“在丰岛海上远远望见清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即下战斗命令……加以炮轰”。明白地招供，甲午战争是由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开始的。

中国军舰遭到日舰突然袭击后，进行了还击。“广乙”号船身小、战斗力弱，开战后不久就受了重伤，船身倾斜，退出战斗，后来驶撞朝鲜海岸浅滩焚毁。

“济远”号是铁甲快舰，吨位大，火力较强，舰上的士兵和某些将领，作战也很英勇，他们和优势的日舰猛烈搏斗。但是管带（舰长）方柏谦是个胆小鬼，在战斗的紧要关头，躲在舱内铁甲最厚的地方，下令逃跑。清朝政府雇用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和自备的运输船“操江”号，恰于这时载运陆军一千多名和各种器材弹药驶来，“济远”号本有护航责任，可是为了逃命，竟丢下运输船不管。日舰“吉野”号紧追“济远”号不放，方

柏谦挂白旗投降。舰上士兵对方柏谦的可耻行为极为愤怒，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等，发尾炮击中“吉野”，使它不敢再追。

方柏谦的逃跑，使“高升”号和“操江”号两船失去保护，结果“操江”号被日舰俘去。日舰“浪速”号又强迫“高升”号投降，船上中国士兵坚决不从，表示“宁愿死在这里，不愿当俘虏”。日舰鱼雷、大炮齐放，“高升”号的中国士兵以步枪英勇还击。当时在“高升”号上的德人汉纳根，曾经详细记载该船被日舰击沉的情形，描写了日本侵略者射击落水的中国士兵，和向“垂沉的船上的人开炮”的残酷情景。

“高升”号被击沉后，清朝政府又幻想英国出来干涉，不愿坚决应战。直到这一希望落空之后，才于八月一日对日宣战。日本也在同一天向清朝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在日舰进行海上偷袭的同时，日本陆军四千余人，在大岛旅团长的率领下，也从龙山向牙山出动，准备以同样的手段偷袭当地的中国驻军。由于朝鲜人民采取种种办法牵制，日军进展十分迟缓。侵略者招供说：“（七月）二十六日，在水原的前军，因昨天征来的朝鲜牛马和夫役悉数逃跑，队长古志少佐大费苦心，百方从事征发，但无应者，全军因此不能出发。”

由于朝鲜人民的反抗，日本侵略军迅速出动偷袭清军的计划，不得不破产。二十八日夜，日军逼近牙山时，清军已有准备。当时清军的布置是，叶志超率部五百人驻守牙山东南的公州为后援；聂士成率军千余人守距牙山七里的成欢。成欢是丘陵地带，前临大河，南北两岸是池沼、水田，有桥名安城渡，北通汉城大道，形势险要。二十九日黎明前，日军开始进

攻，在安城渡遭到清军伏击，死伤很多。天亮后，日军以大队进攻，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叶志超不为后援，众寡悬殊，聂士成不支，率众突围，退往公州。

聂士成率军由成欢退到公州，叶志超正在指挥军队放弃公州逃跑。他看到聂士成说，“公州不可守，不如绕道至平壤，会合大军，再图进取。”说罢策马而去。叶志超逃跑后，聂士成也带队跟上，合军北走。因为害怕和日军遭遇，他们远远绕过汉城，沿朝鲜东部山地边缘，抄小道撤退，走了二十多天，才到平壤。当时正是炎夏，士兵沿途病死很多。叶志超逃到平壤后，竟然无耻地谎报“战功”。李鸿章根据叶志超的报告，奏称叶军在牙山“大捷”，沿途屡败日军，“战功”甚大。逃跑将军叶志超，竟得到清廷的明令嘉奖，并被提升为平壤各军的总指挥。这一颠倒黑白的奖赏，大大破坏了各军的士气。驻平壤的清军，听到叶志超被任命为“统帅”的消息，“一军皆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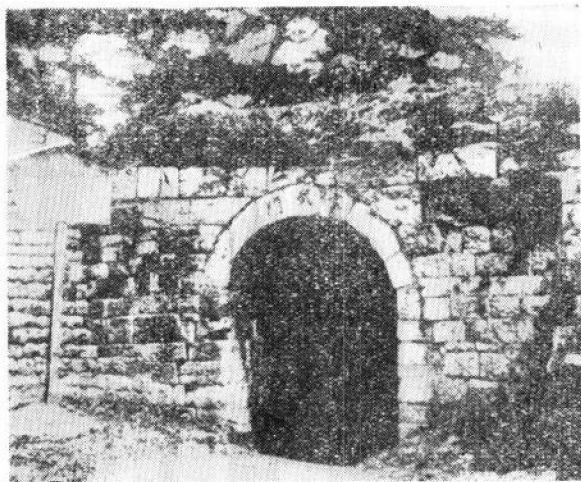
平壤属朝鲜平安道，临大同江，三面有城墙，高达十米，不易攀登，四面多泽沼，形势险要，利于防守。当时云集平壤的清军各部，总数将近两万人，但腐败不堪。将领对士兵层层剥削，士兵“只能养命，不能果腹”；武器则“药不配弹”，“子不对枪”，战斗力极差；各军之间，本来派系倾轧，各不相下。逃跑将军叶志超被任为“统帅”后，各将领更有意见，不服调度。清军初入平壤时，朝鲜人民夹道欢迎，热烈劳军。后来由于清军纪律败坏，抢掠骚扰，致使平壤一带商民，相继逃避。清军聚集平壤后，既不争取军事上的主动进攻，又不积极布置防务，而是把大军集中在平壤城，束手等待敌军来攻。

五、平壤撤退与黄海海战

成欢战役后，日军经过一个多月准备，决定于九月十五日进攻平壤。九月二日，日军万余人分路前进，一路正面进攻，一路偷袭平壤西南面和北面，另一路从元山出发，包抄平壤清军后路。这时清军才匆忙划分防区。左宝贵部六营守城北玄武门山顶，叶志超部守西门，卫汝贵部守西南门及南门，马玉昆部守东门及大同江左岸，叶志超居城中调度策应。

十二日日军到达大同江东岸，十五日晨分四路对平壤发起猛烈攻击。东路战事十分激烈。马玉昆率部扼守大同江东岸，奋力抵抗。自清晨四时激战至午后，终于击退日军的进攻。北路战事也极为激烈，左宝贵亲自登玄武门指挥，士兵拚死抗拒。北门外炮兵阵地相继失守，左宝贵中炮阵亡，玄武门为日军占领。另一路日军偷袭平壤西南门，为卫汝贵军击退。

日军占领玄武门后，不敢立即入城。当时马、卫两部已击退东西两路日军，但叶志超却卑怯地下令撤退。就在当天夜里，叶志超率军趁暴风雨仓皇逃出平壤，狂奔五百里，退过鸭绿江，一直退到九连城、凤凰城一带。从此战火烧到了中国境内。



甲午战争时的平壤城北玄武门

在日本侵略军进攻平壤的过程中，平壤一带的朝鲜人民进行了各种反抗活动，如隐藏粮食，隐蔽牲畜，割断电线等，组织游击队，处处给日本侵略军以打击。在朝鲜南部，全琫準领导下的农民起义军，在十月初发动对公州、汉城的围攻，使日本侵略军十分狼狈。伊藤博文在给内务相井上馨（音心 xīn）的信中说：“东学党现在南部甚为猖獗，大鸟公使屡次给我来信请求派遣援军。”可见日本侵略者当时的处境。

日本侵略者发动侵略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凡是日军通过或驻扎过的道和郡，都受到残酷蹂躏，平壤地区受到的破坏特别严重。英勇的朝鲜人民为了抗击侵略者，有什么就用什么武装起来，和侵略者进行拚死斗争。日本侵

略者已陷入朝鲜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这种形势，对于清军无疑是极为有利的。如果当时清朝军队不是那样腐朽，完全有可能和朝鲜人民一起，打败侵略者，取得平壤战役的胜利。但是，清军却一战即溃，使朝鲜人民大失所望。平壤战败，叶



船桥里(大同江左岸)朝鲜民房被日本侵略军破坏的情况

志超逃跑后，少数未撤走的中国兵士，留在朝鲜继续和朝鲜人民并肩战斗，打击日本侵略者。中、朝两国人民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在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朝鲜人民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所指出：“朝中两国人民在悠久的历史年月中共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曾互相给以帮助。特别是通过反对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共同斗争，朝中两国人

民的战斗友谊进一步得到了加强。”^①

平壤战役后的第二天，九月十七日，日本侵略舰队就在鸭绿江口的黄海海面上，挑起了一场激烈的海战。

九月初，平壤吃紧，清朝政府从海道派援军到鸭绿江边的大东沟。十二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出动护航，于十六日抵大东沟。护航任务完成后，舰队准备于十七日返航旅顺。十七日上午九时左右，忽发现西南方远处海面上出现如柱薄烟，远远望见来船都悬挂美国旗。中午时，来船渐近，共十二艘，都改悬日本旗。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铁甲舰上，与总兵兼旗舰“定远”号舰长刘步蟾（音缠 chán）等议定，以“分段纵列”的阵势，起锚应战。这时，中国舰队实际投入战斗的共十艘，另有鱼雷艇四艘；日舰十二艘。从力量对比来看，中国舰队共三万一千吨，日本舰队共三万八千吨；中国舰只较旧，主要战舰“定远”号和“镇远”号舰龄已达十二年，日本舰只大多在甲午战争前下水不久，式样新，动作快；日舰航速最快的“吉野”，每小时可达二十三浬，其余各舰也多为十九浬，而中国舰只最快的“致远”“靖（音竟 jìng）远”，每小时只有十八浬，其余各舰多为十四、五浬；日舰的装备是新式的速射炮多，中国舰队的优点是“定远”“镇远”两主力舰吨位大（各七千吨），炮大，装甲厚。总的来看，双方舰队在装备上各有长短。

两支舰队相遇，日舰以“吉野”“浪速”等四艘快速战舰为前锋，日本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率旗舰“松岛”及其他七艘舰只组成本队，排成鱼贯纵列，依次衔尾前进。日本舰队的阵势，

^① 《朝中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金日成选集》第六卷，第三五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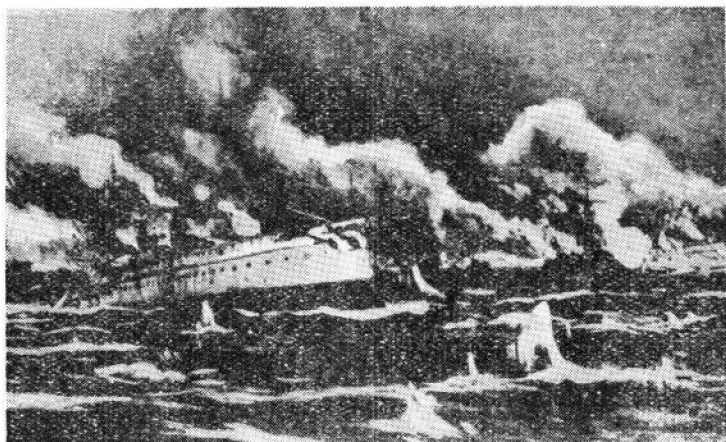
黄海大海战的一角

有利于充分发挥快速舰的机动灵活性，和一舷齐射的快速炮的威力。中国舰队在开始迎战时，由于刘步蟾胆怯惧战，企图让自己所乘的旗舰居中躲避敌舰炮火，违反议定“分段纵列”的阵势，发出信号，令舰队横列，让主力舰“定远”“镇远”居中。两翼弱舰见所处位置危险，故意缓进，舰队成了两主力舰突出在前方的半月形。这时，双方舰队接近，相距约一万余米，日舰似将先攻中国舰队最弱的右翼，丁汝昌下令全队同时向右转移四度，以便有可能使主力舰“定远”“镇远”先与敌舰接触。各舰遵令移动，独刘步蟾停留不动，逃避接触，并突然发射十吋口径的大炮。丁汝昌正在旗舰“定远”号飞桥上指挥，飞桥因年久失修，被大炮震动破裂，丁汝昌从空中跌落，身受重伤，不久帅旗也被打落。丁汝昌受伤后拒绝随从把自己抬入舱中，坚持坐在甲板上士兵能够看到的地方，鼓励士兵作战。可是，丁汝昌只能鼓励“定远”号甲板上的士兵，已不能指挥全舰队。这样，炮战一开始，中国舰队的各舰就几乎是各自为战，完全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尽管上级指挥如此不力，大部分中国军舰的广大爱国士兵，都能同仇敌忾，勇敢应战，表现出中华民族誓与敌人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黄海海面炮声震天，硝烟弥漫。旗舰“定远”号中炮起火，士兵毫无畏惧，沉着灭火，并迅速发炮轰击敌舰。有的炮手身负重伤，依然坚守岗位，裹伤再战。无论日本方面或参与战斗的外国顾问，都承认中国的水兵“炮术极佳”，“可称善战”。可是，中国舰队由于李鸿章的腐朽统治，炮弹奇缺，旗舰“定远”号上最大的巨炮，仅有实战用的炮弹三枚，以致巨炮发射的，

多为“练习用之炮弹”。

在战斗中，“致远”号勇往直前，中弹最多，船身已严重倾斜，弹药也将用尽。在这危急时刻，管带邓世昌见敌舰“吉野”号甚为猖狂，认为“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下令开足马力向“吉野”号撞去，准备和它同归于尽。不幸为“吉野”号放出的鱼雷击中，邓世昌同全船两百余人壮烈牺牲。



英勇作战中雷沉没的“致远”号中国军舰

“致远”号沉没后，“济远”号管带方柏谦和“广甲”号管带吴敬荣，害怕敌舰转过炮口轰击自己，慌忙转舵逃跑。匆忙中撞沉已负重伤的“扬威”号。“广甲”号脱离战斗后，恐怕敌舰追赶，沿海岸浅滩行驶，中途搁浅，吴敬荣弃船登陆，狼狈逃生。

战斗愈来愈激烈，“经远”号管带林永升浴血抗击，中弹阵亡，船也被焚沉没。

但是中国的海军士兵们并没有气馁，而是坚持战斗，给日本舰队以沉重打击。日方记载甲午战争的《日清战争实记》中说：“三点三十分，‘镇远’所发的三十公分半巨弹两枚，命中我旗舰‘松岛’下甲板炮台的第四号炮，放在近旁的十二公分炮的装药因此爆发，霹雳一声，船舳倾斜了五度，冒上白烟，四顾黯澹。炮台指挥官海军大尉志摩清直以下，死伤达一百余人，死尸山积，血流满船，而且火灾大作，更加困难。”“吉野”已完全失去战斗力，只剩下一具躯壳。其他日舰如“扶桑”“赤城”和“西京丸”等，也都负重伤，几乎沉没。

下午五时，战斗已进入最后阶段，“靖远”号见旗舰“定远”号桅楼坍塌，不能号令指挥，就主动升旗集队。日舰伤亡惨重，不能再战，旗舰“松岛”已完全瘫痪，由“桥立”号代行升旗收兵。一场激烈的海战结束了。

黄海海战，中国舰队虽受了不少损失，日本舰队也没有取得很大便宜。但黄海海战后，李鸿章为了保存他的实力，在奏报中有意夸大战败程度，强调中国舰队不及日本，以此为理由，命令舰队避战港内，不准出击。从此，把黄海的制海权拱手交给日本，让日本侵略舰队横行海上，无所顾忌。

六、战火烧到中国境内

平壤、黄海两战，是甲午中日战争中两次重要战役。中国人民在战争中反侵略斗争情绪不断高涨，使资本主义列强担心，如果日军大举进攻中国大陆，引起中国社会的动荡，将会影响它们的利益。因此，在中国侵略利益最大的英国，首先出来酝酿“调停”。

战败的消息传到中国国内，主战派纷纷上奏折弹劾李鸿章，翁同龢、李鸿藻主张严办。而主和派则企图借战败重开和议，又活跃起来。九月底，西太后起用中法战争期间被她罢职的奕訢(音亦心 yìxīn)，主持总理衙门。奕訢主张对日妥协，他上台后，一面请各国公使调停战争，一面示意李鸿章进行活动。

这时英国已在进行活动。十月六日，英国正式向美、俄、德、法等国，提出联合调停的建议。同时，也向中国试探，并施加压力。十日，英国驻北京公使欧格讷去天津与李鸿章晤谈，对李鸿章说，中国对战事无把握，不如和日本议和，赔款了事。十二日，沙俄公使喀西尼也向李鸿章表示，应趁日军“尚未入境之先，速商停战之法”；并说中国总要吃点亏。李鸿

章原来希望英、俄能出面干涉日本，而欧格纳和喀西尼却反过来劝中国求和，不免使一心想求洋主子出来干涉的李鸿章有点失望。很明显，英、俄这时都是企图以牺牲中国，满足日本一些要求，从而结束战争，以保证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英国政府十月六日建议有关各国联合调停的基本点，就是各国保证朝鲜“独立”和中国向日本赔款，借以获得不损害他们利益的“和平”。沙俄原则上是赞成这个建议的。企图趁火打劫的德国，则认为还不到调停的时机。美国则坚决拒绝英国的建议。由于美国和德国反对，英国的所谓联合调停因而流产。

美国为什么拒绝参加英国建议的各国联合调停？当时从华盛顿发往伦敦的一则电讯，透露出它的秘密。这则电讯说：欧洲各国打算联合干涉中日战争，以免中国因遭受更大的打击，而发生暴动，以致“侵犯”列强在华的权益，但美国的看法则不是这样。美国认为应该打到使日本心满意足，然后再行议和，才能迫使中国让出开矿、筑路等特权，这样列强都能从中国得到好处。这则电讯，把美帝国主义支持日本侵略和外交上的狡诈，充分暴露出来。另外，当时美国驻中国的公使田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秘密报告中，也明确地表示应该让战争继续打下去，不要在目前就迫使战争结束。他认为要直到中国战败、清廷受到威胁时，“才是外国进行干涉的时机”。如果把上述电讯和田贝的秘密报告结合起来看，可以明白地看出，美帝国主义当时拒绝英国联合干涉建议的黑心肠。

其实，英国提出这次联合干涉的建议，本来就是很矛盾的。它不愿意战争向中国大陆发展，影响到它在中国的侵略

利益,但远东形势急剧变化,日本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又使它日益倾向日本,考虑选择日本作为它在东方对抗沙俄的盟国。这就是它提出要中国给日本赔款以结束战争的用意所在。英国提出联合干涉,既然本身就具有矛盾,因此当这个建议得不到德国支持,遭到美国反对,而狡猾的日本侵略者,又看透了英国并无干涉的决心,以议和的条件尚未成熟,婉辞谢绝时,英国也就把它的建议收起了。

英国联合干涉的建议,使日本侵略者感到有加速军事行动的必要。当时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给首相伊藤博文的信中说:“外国干涉之端已开,故我军队之运动尤须迅速。在外国干涉未烦难以前,不论占领何地,皆为必要。”于是,日本侵略者就迅速把战火烧向中国境内。

自平壤、黄海战役后,日本侵略军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和布置,编成两军,于十月下旬,分两路同时向中国进犯。第一军以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头子,从平壤北犯,由义州渡鸭绿江,进攻辽东;第二军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头子,从仁川渡海。日军从海陆两路进犯旅顺、大连。

由于平壤战役后,清军对鸭绿江南岸弃而不守,山县有朋率领的日军第一军,便于十月二十日不战而占领义州。二十四日日军前锋偷渡鸭绿江,二十五日大队继进。这时驻守鸭绿江边境的清军近四万人,满洲将军依克唐阿十二营自立一军,其余各军由淮系将领、四川提督宋庆指挥。这时清军完全象在平壤一样,战略上消极被动,一心想依赖鸭绿江天险,阻挡日军。二十四日日军前锋小队偷渡过江,第一排枪声就

惊散了许多清军。除聂士成部在虎山稍作抵抗外，其他各军都不战溃退，宋庆和依克唐阿仓皇逃走。不到三天工夫，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在中国境内的中、朝交通要道安东（今丹东市）和九连城。接着，日军又以九连城为大本营，分路进犯，先后攻占长甸、宽甸、凤凰城、岫（音袖 xiù）岩、海城等战略要地。

在日本侵略军第一军渡鸭绿江进犯的同时，日军第二军也于十月二十四日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从背后袭击旅顺和大连。

旅顺和威海卫是北洋海军的两个基地，夹海相望，控制着渤海的门户。旅顺背山面海，水深港阔，形势险要。李鸿章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用了几千万两银子，在这里建下巨大的船坞以及海岸炮台、陆路炮台三十余座，安有大炮一百多门，其中多数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德国克虏伯厂出产的新式大炮。李鸿章自夸为“固若金汤”。但是，事实证明，在腐朽的清朝政府统治之下，即使防御工事再坚固，大炮再好，也是不中用的。

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前六天，李鸿章就有放弃旅顺的打算，命令北洋舰队驶离旅顺，避往威海卫。日军三万余人在花园口登陆，共用了十二天时间。在日军登陆期间，丁汝昌亲自跑到天津去见李鸿章，要求率领舰队进援旅顺。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训斥丁汝昌说：“你好好在威海卫守住你的几条船，此外没有你的事！”让日军从容登陆，不加阻击。

当时，在旅顺、大连一带驻防的清军，共三十余营，约两万人，兵力不算单薄，但在李鸿章失败主义的支配下，大多数的军官在敌人进攻面前，所关心的只是迁移财物、家属，毫无抵

抗意志。十一月初，日军进至离旅顺、大连后路重镇金州约一百三十里的貔（音皮 pí）子窝，旅、大吃紧。驻防旅顺的六支清军中，只有徐邦道率所部两千余人，进援金州。驻防大连的清军赵怀益部，官兵也请赴援金州，以固旅、大的后路。但赵怀益竟说：“我只奉命守炮台，与后路的防御无关。”禁止部下赴援。十一月五日，日军开始进攻金州，徐邦道孤军苦战，死伤甚重。六日，向赵怀益请援，赵正在码头监督兵勇搬运饷银、行李、杂物上船，逃往烟台，却以守炮台为由，不肯援救。金州失陷后，徐邦道退回旅顺。

十一月七日，日军分三路进犯大连，赵怀益已于先一日弃大连炮台逃往旅顺，兵勇溃散。等到八日日本海军从海上来攻时，发现大连炮台上已站满了日本兵。由于清军的极端腐朽，日本侵略者就这样意外地占领了大连湾。

日本侵略者侵占大连十天后，十八日开始向旅顺进攻。当时旅顺还有守军一万三千余人，负责指挥各军的营务处道员龚照珩，乘鱼雷艇逃走。军心涣散，军官们纷纷搬运私人财物，准备逃跑。只有徐邦道率残军北行抵抗。十九日徐邦道的军队在旅顺以北地区，英勇战斗了一整天，两度截击日军，给以重创。日军不断增兵，徐邦道军队很少，没有后援，士兵饥饿乏食，被迫退回旅顺。二十一日日军集中大炮一百多门，猛攻旅顺，二十二日椅子山、案子山、黄金山等陆海炮台的守兵，经过近半天战斗后，相继溃散，旅顺陷落。这个经营了十六年的海防要塞，连同仓库里的大批军械、器材，全部为日本侵略者所得。

日军侵占旅顺后，兽性大发，进行血腥的大屠杀。对于日本侵略者这种残暴的大屠杀，当时一些欧美资产阶级学者，也有所记载。英国的齐·伊·胡兰德，在他所著《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法》中说：从日军占领旅顺的“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幼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个中国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有的美国报纸说，“日本是披着文明的外衣，实际是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现已摘下文明的假面具，露出野蛮的本体，……”就连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也不得不说：“旅顺口事件，虽无传说之甚，可能有若干无谓的杀戮。”

七、清军的全面溃败

十月下旬,日本侵略军疯狂入侵鸭绿江后,清朝政府十分焦急,当时它看到英国联合干涉的计划已成泡影,就转请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出面调停。这时美国政府认为,排斥其他列强,联合日本对清朝统治者进行勒索的时机已至,便出来为日本侵略者帮忙。十一月六日,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根据美国政府训令,向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表示,美国愿意居间调停,并暗示如果战争不适时而止,可能引起欧洲列强进行不利于日本的干涉。

日本完全理解,由美国出面调停,对它最为有利。十一月十七日,陆奥宗光以私人谈话的形式,和谭恩达成谅解,决定为避免第三国干涉,美国不公开担任调停人,而以“传信人”的身份参加和议,以便从中操纵。二十一日,田贝即以“传达”日本政府的意见为名,提示清朝政府可通过自己,直接向日本求和。就在这一天,旅顺要塞为日军侵占,战火烧到了渤海的门户,迫使清朝政府决心直接向日本求和。第二天(二十二日),田贝电告谭恩说,清朝政府已直接委托他本人向日本求和,要谭恩将此意转告日本政府。在这之前,李鸿章曾派天津海

关税务司德璀琳（德国人），携带李鸿章给伊藤博文的函件，赴日本试探求和条件。日本政府以德璀琳不是正式使臣，拒绝接见，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通过田贝告诉清朝政府：“中国政府如真诚希望和平，可任命正当资格之全权委员，日本政府当于两国全权委员会商时，宣布日本政府之停战条件。”日本侵略者极为狡猾，它害怕如果把极为苛刻的议和条件公开出来，可能引起西方列强的干涉，所以对议和条件密不透露。清朝统治者急于求和，在田贝的怂恿下，便于十二月下旬，正式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音环 huán）、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

美国在通过驻华公使田贝，诱迫清朝政府正式派出赴日求和代表的同时，又派前国务卿科士达，以“私人”身份，充当清朝政府全权大臣的顾问，以便直接操纵和谈。科士达于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先于张荫桓等到达日本。陆奥宗光公开声明，“我对科士达先生之来，是很满意的。他是我个人的朋友。”这个清朝政府代表团的顾问，竟使日本外相“很满意”，并声称是自己的朋友，这个顾问究竟是谁家的，不就很清楚了么？

清朝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和卑屈求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当主和派积极进行求和活动的时候，御史安维峻上书清廷，请杀李鸿章，指出议和就是卖国。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朝政府在发表张荫桓为求和代表后，不久又任命湘系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湖南巡抚吴大澂（音呈 chéng）和宋庆为帮办，负责指挥山海关外的军事，企图和战并行。一

八九五年一月，张荫桓等去日本前，路过上海，上海人民纷纷抗议，张贴匿名揭帖，要求继续抗战，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反侵略的强烈愿望。

日、美勾结，虽然诱使清朝政府派出了正式求和代表，但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双方要达成协议，还有困难。日本侵略者正气焰嚣张，统治集团内讨论提出的议和条件极为苛刻。割地一项，有的主张除辽东半岛及台湾外，还要使中国割让吉林、盛京(辽宁)、黑龙江三省；赔款一项，日本大藏大臣要价竟高达十万万两。而清朝政府方面，淮军虽已一败涂地，但还想试试湘军的力量。清廷任命湘军首领刘坤一负责关外军事，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清朝政府内部，付出少量赔款是通得过的，但割地则为当时的舆论所不允许。总之，清朝政府虽急于求和，但当时还不愿意无条件投降。

日本侵略者也看出，清朝政府一时还不可能全部接受侵略要求。他们认为，清朝政府没有派出象李鸿章这样的大卖国贼为议和使臣，而是派遣地位较低的张荫桓等人，担负议和重任，是清朝政府还不承认处于战败地位的表现。因此，在张荫桓到达日本之前，伊藤博文便和陆奥宗光商定，有意拒绝这次和谈，借此对清朝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再配合军事上的进攻，以便将来在更有利的地位上，进行勒索。二月一日，张荫桓等在广岛与伊藤、陆奥第一次会晤时，伊藤即按预定计划，指摘张荫桓的“全权不足”，拒绝谈判。事实上，所谓“全权不足”，完全是日本侵略者的借口。后来清朝政府以电报声明张、邵有谈判签约的全权，可是日本侵略者仍然表示拒绝。张荫

桓在日本受到种种侮辱，最后被迫于二月十二日离开日本回国。科士达在广岛谈判期间，一直和日本侵略者眉来眼去，此唱彼和。据日方的《日清战争实记》中记载：“科士达临去时，对使节的不妥适，表示愤怒。对人说，我到北京，必请清廷派遣完全使节，以充分的诚实完成媾和。”

日本侵略者在制造借口拒绝谈判的同时，竟然公开指名要李鸿章出面向他们出卖中国的权益。伊藤博文曾以私人谈话的方式，向清朝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伍廷芳说：“爵位名望愈高，对谈判愈为有利。……例如任命恭亲王或李中堂（李鸿章）者担当此项任务，最为适当。因彼此谈判的一切结果，不止于一纸空文，而是需要有力者加以实行。”日本侵略者是很了解李鸿章的。陆奥宗光预料李鸿章“心中已决定，不论如何代价，皆不能不购买和平”。后来事实证明，李鸿章就是这样干的。

日本侵略者在进行谈判的同时，对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军港和港内的北洋舰队，发起猛烈攻击。

威海卫突出在山东半岛上，南北两岸延伸入海，形成半圆形，港口刘公岛和日岛横列，分港为东、西两口，形势险要。这里设有海军提督衙门，和各种海军设施，威海卫南北两岸、刘公岛和日岛，皆设有炮台，共有大炮一百多门，是北洋海军的第二个优良军港。

黄海海战以后，李鸿章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命令北洋舰队避居威海卫，严禁出海巡弋，形成了坐等挨打的局面。一八九五年一月中旬，日军两万余人在海军护送下，进犯威海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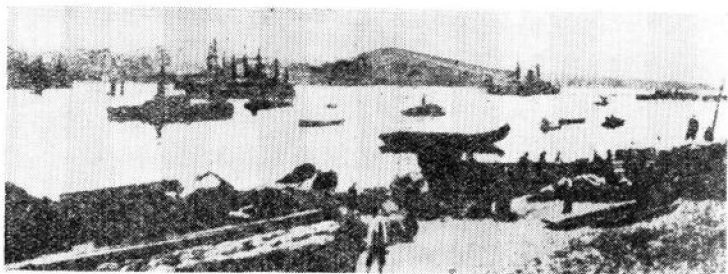


甲午战争时的威海卫军港——之一

一月二十日，日军在威海卫的东侧成山头登陆，采取和进攻旅顺时一样的包抄后路的老办法。日舰号称二十五艘，但多数是木质小船，能战的不过十艘。当时停泊在威海卫港内的北洋舰队，还有铁甲舰七艘、炮艇六艘、练船二艘、鱼雷艇十三艘。如果能趁日军登陆时，出港发动袭击，完全有可能粉碎日军登陆计划；或者切断登陆日军的海上供应，使它成为失掉后方供应的孤军。但是在李鸿章“保船”命令束缚下的北洋海军，却避居港内，坐视敌人从容上岸，包抄自己的后路。

日军登陆后，即日攻占荣成县，分兵两路，进扑威海卫。二十八日，日军先攻南岸炮台，负责防守炮台的分统刘超佩，早在日军逼近时，借口受伤，坐船逃走。炮台守兵自发地起来抵抗，北洋舰队也在港内发炮支援，战斗两日夜，击毙日军左翼司令大寺少将，杀伤不少日军。但终因守军既失指挥，又无援军，南岸炮台于三十日为日军攻占。

南岸炮台失陷后，驻守北岸炮台的统领戴宗騫(音千 qiān)和分统刘树德。相率逃走，三十一日日军不战而占据北岸炮台。



甲午战争时的威海卫军港——之二

日本陆军占据南、北炮台后，日本海军封锁东、西港口，海、陆一齐发炮，对港内进行轰击，北洋舰队陷入极困难的境地。但即使处于这种不利的局面下，刘公岛和日岛炮台上的守兵，与港内军舰上的水兵，仍然坚持抵抗，英勇战斗，决不屈服。

港内舰队的坚决抵抗，和港口已经布雷，使日本军舰不敢贸然开入港内，而是常常利用鱼雷艇，进行夜间偷袭。二月四日黎明前，日本鱼雷艇两艘，潜入港内，偷袭旗舰“定远”号。“定远”号发炮攻击，敌艇一沉、一毁，但“定远”号本身也受重伤，后来自行炸毁。六日，“来远”“威远”等舰，相继为日本鱼雷艇击沉；日岛上的炮台与弹药库，都被日军炮弹击毁，不能再守，形势愈来愈严重。第二天（七日），又发生了十三艘鱼雷艇逃跑的事件。这一天，日方舰队聚集东口猛攻刘公岛炮台，丁汝昌命鱼雷艇管带王平，率鱼雷艇袭击敌舰。但卑鄙怕死的王平，不但不去袭击敌舰，反而率全部鱼雷艇全速开出西口逃跑。结果遭到日舰追击，或搁浅或被俘，十三艘鱼雷艇没

有发挥任何作用，就这样败毁了。

形势愈来愈严重。海军副提督英国人马格禄与顾问美国人浩威，勾结一批无耻将领，唆使刘公岛上的士兵、水手哗变。马格禄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原为航行中国沿海的商船“金龙”号船主。这家伙对于海军军事一窍不通。浩威来自称挟“奇技”东来，混入北洋海军。其实这人是卖假药的骗子，据记载，很可能还是日本侵略者的间谍。

士兵、水手哗变后，聚众骚乱，鸣枪过市，声称“向丁提督乞生路”。入夜，舰队中的洋员劝丁汝昌投降，丁坚决拒绝。第二天，丁汝昌声言陆上援军将到，骚乱始平息。

二月九日，日军又从水陆夹击，“靖远”号中弹沉没。十日，马格禄、浩威勾结营务处道员牛炳昶和一批将领，再次煽动部分士兵、水手，胁迫丁汝昌投降。丁沉思许久，下令各船管带同时沉船。各将领怕空手投降，引起日本侵略者愤怒，拒绝执行命令。

二月十一日，日军水陆夹攻更紧。丁汝昌从烟台得到密信，知道山东巡抚李秉衡已远逃莱州，等待陆上援军已不可能。同时岛上弹药将尽，北洋舰队已到了最后时刻。丁汝昌于夜间召开会议，提出率领剩余舰只，冒死突围。马格禄、浩威等洋员与诸将领都反对，自动散会。丁汝昌在绝望中服毒自杀。十二日晨，帝国主义分子马格禄、浩威伙同一小撮民族败类，盗用了丁汝昌的名义，由浩威起草投降书，向日本舰队投降。耗费了中国人民大量金钱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就这样可耻地覆没了。

丁汝昌统带北洋舰队，应当对海军的腐败混乱与最后失败负重要责任。但他坚持抵抗日本的侵略，黄海海战，受伤不退，威海被围，宁死不降，在当时清军将领中，还算是难能可贵的人物。

北洋舰队覆灭后，日军集中力量进攻辽东。

当时山海关一带驻扎的湘军、淮军，共一百多营，计六万人。负责指挥的刘坤一、吴大澂等，都是些腐朽的官僚。刘坤一昏庸老朽，驻守山海关，对军事漫无布置。吴大澂是当时清朝官僚中的“清流派”，好纸上谈兵，出师时威风凛凛，排场十足，而实际上是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怕死鬼。湘军和淮军同样腐败。驻扎山海关的各营，“竟有十营不满五营之额，八营不足三营之数”。军官克扣军饷达到惊人的程度，士兵每人月饷白银四两，实际仅发二两，竟有营官把在天津领到的军饷十万两，全数运回老家。这样腐朽的军队，失败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日军开始进攻之前，一八九五年一月中旬到二月下旬，清军曾四次反攻海城，但由于军队腐败，毫无结果。二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从海城分路进犯。当时宋庆所部五十多营、三万人守营口，吴大澂部魏光焘（音桃 táo）、李光久等军十一营集中牛庄。三月一日，日军侵占牛庄东面的鞍山站，切断牛庄和辽阳的通路，转而进攻牛庄。

三月四日，日军分三路进犯牛庄，魏光焘、李光久军全被围在牛庄市内。日军冲进市内，湘军士兵据民房苦斗，虽然英勇，但因缺乏指挥和联络，死伤近两千人。魏光焘、李光久突

围西走。日军占牛庄后，大肆屠杀抢掠。

驻守田庄台的吴大澂，听说牛庄失守，“弃冠脱剑”，连夜逃跑。各将领随着溜走，军队不战而溃。

田庄台在辽河西岸，是全军的后勤机关所在地，又是营口的后路。驻守营口的宋庆，听说吴大澂西逃，连夜率主力回守田庄台，仅留少数军队守营口。七日，日军不战而取营口。九日，日军踏冰渡辽河，守河兵大溃。日本侵略军集中一百多门大炮猛攻田庄台，宋庆所部溃败。日军侵占田庄台后，纵火焚烧，使这个有一万多居民的繁荣市镇，一日之间化为灰烬。田庄台失守后，宋庆、吴大澂退至锦州石山站。

从日军发动进攻时起，仅仅十天工夫，清军百余营大军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六天之内连失牛庄、营口、田庄台。这是继平壤、九连城以后，陆军最大的一次溃退。事实证明，清朝主战派最后一试的湘军，和淮军一样腐朽，也是不堪一击的。

这时，日本侵略者由于国内财政困难，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而腐朽的清朝政府由于战败而惊恐万状，决意屈膝投降。此后，双方除偶然有零星的小战外，在东北地区已没有大规模的战斗。

八、东北人民的英勇抗战

一八九四年十月底，清军在鸭绿江全线溃败，战火烧到中国境内。侵略者疯狂侵入国土，清朝政府及其军队的投降主义和腐朽无能，激起了东北地方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广大农民、矿工、猎户、渔民及一部分爱国士绅，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积极组织起来，投入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武装斗争。“辽阳并凤(城)、岫(岩)、海(城)、新(民)交界周围七八百里，无民不团”。岫岩州东南的桂花岭，有个来复社，“居民皆习淘煤，俗呼为‘煤黑’，连村数十，自练乡团。日寇来犯，乡团极力堵御，以抬枪毙敌无算。自十月中旬至下旬，相持甚久。”正是由于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英勇抵抗，才使渡过鸭绿江侵入辽东的日军第一军在攻占海城后，不能轻进。

日军第二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后，也同样遭到当地人民英勇抵抗。貔子窝、碧河一带八百多农户，看到清军纵容日军在花园口登陆，横冲直闯，搬运炮火辐辏达十二天之久，而不加阻击，再也忍耐不住，在高武的组织 and 率领下，用铁锹、锄头、镢头等农具，袭击了侵略军的军营，杀死许多日军。

日军进犯东北，不仅地处第一线的辽东人民自发组织起

来抗击侵略者，就是辽阳北部和吉林一带人民，也同样自发地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准备随时歼灭来犯的敌人。有的则奔赴前线同辽东人民并肩作战。一向被统治阶级诬为“金匪”的吉林夹皮沟贫苦农民武装首领韩登举，率领三千名夹皮沟英雄儿女，穿林海、跨雪原，来到海城附近，参加战斗。一次，海城日军三千余人出城骚扰，韩登举率众奋战，打死打伤敌人数百人，使侵略军不敢轻易出城乱窜。

辽东广大人民群众在辽阳保卫战，收复宽甸、长甸的战斗，以及旅顺人民反屠杀的搏斗中，突出地表现出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顽强反抗精神。

辽阳是盛京省城奉天(今沈阳)的大门，辽阳的得失，关系盛京的安危。日本侵略军在侵占海城等地后，凶焰甚高，扬言要到盛京过年。在一八九五年一月间，日军连续四次向辽阳进犯，都被英勇机智的武装人民所击退。此后，日军曾多次窜犯辽阳，辽阳一带人民用“昼张旗帜，夜燃火把，出没往来，虚实兼用”的巧妙战术，终于粉碎了日本侵略军侵占辽阳的计划。辽阳人民的保卫战，使日本侵略军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仅能龟缩在海城一带各县城里，广阔的乡村始终控制在中国人民手中。辽阳人民的武装斗争，捍卫了辽阳这个重镇，使日军不敢再向北进犯。

一八九五年二月，辽东人民又发动了收复宽甸、长甸的激烈战斗。自安东、凤凰城失陷后，东边道一带人民，先后组成十支队伍，每支一、二千人不等。当日军在宽甸一带烧杀时，“壮夫老幼，死战不降”。一八九五年二月，前线清军反攻海城

时，东边道一带武装群众，认为宽甸、凤凰城一带是日军后路，决定牵制其后路。于二月二十五日向宽甸发动进攻，在欢喜岭等地与日军展开激烈的遭遇战，打死日军七、八十名，活捉日军头目广田甚吉，缴获枪械物品多件，随即收复宽甸城。三月一日，武装群众又乘胜进攻长甸镇，击毙日军七、八十人，日军弃长甸逃跑，长甸镇遂即收复。东边道人民英勇奋战，使日本侵略军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在旅顺，广大人民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屠杀，宁死不屈，纷纷拿起斧头、铁锤、菜刀，拚死搏斗。铁匠苑某在日本侵略军闯进他家时，手握大铁锤，把千仇万恨凝在大铁锤上，抡起大锤，一锤就砸死一个，一连消灭了四、五个敌人。机匠陈永发，得知日本侵略者要来杀他，临危不惧，拿起斧头躲到机架后面。一个敌人刚踏进门，他一跃而起，挥起斧头，一斧砍开了这个敌人的脑袋。就连十几岁的少年，也采用各种形式严惩日本侵略者。有一个少年装成乞丐，潜入日军军营，将毒药投入饮水缸中，毒死很多敌人。这个爱国少年被捕后慷慨陈词，大声说：“我为国杀敌，早准备一死，可惜毒药还没全部用尽，没能够把你们这些鬼子杀光！”说罢，从容就义。

东北人民这些可歌可泣的斗争史迹，与清军在辽东战场不战即溃和临阵脱逃的可耻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事实证明，人民群众是抗击外国侵略者的主力。只要发动群众，日本侵略者是完全可以打败的。但是，腐朽的清朝政府敌视人民，不让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抵抗，所以自发的人民抵抗，无法改变当时中国失败的全局。

九、《马关条约》

日本侵略者拒绝广岛谈判的重要借口之一，是张荫桓的地位太低，指名要李鸿章出任议和代表。张荫桓等被迫离日回国的第五天，即二月十七日，日本侵略者就进一步向清朝政府指出，如果要求和，除了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和赔款外，还必须同意割地，否则即使再派议和使节，日本也决不停战。这时，威海卫已失陷，北洋海军覆灭，日本侵略者已控制了渤海湾，威胁着天津和北京。面对着这一严重形势，清廷惊恐万状，官僚们都哀叹：“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拿不出办法来。于是，主和派的后台西太后便召李鸿章去北京，面授机宜，准备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意旨，派他前往日本议和。这实际上就是答应割地投降的最后决定。

李鸿章受命后于二月二十二日到北京。这时主战派也不再喧嚷主战了，但对割地问题还与主和派进行了一场争吵。因为割地事关重大，不仅全国人民反对，就是清朝政府中多数官僚，也不赞同。主和派奕訢、奕劻（音匡 kuāng）、孙毓汶等，竭力主张割地，认为不割地不能结束战争。主战派翁同龢等曾反对割地，但对于如何应付大局，仍束手无策，因而赞

同李鸿章再试探一下英、俄、德、美等国的态度。

正在这个时候，久居中国、披着传教士外衣的英帝国主义分子李提摩太，加紧策动李鸿章卖国。李鸿章又使出他“以夷制夷”的法宝，想依靠英国。二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根据李提摩太的“建议”，向英国驻京公使欧格讷提出卖国方案——《中英同盟密约》草案。草案中要求英国政府进行干涉，设法结束战争，而使中国不丧失任何领土。中国政府为了报答这一援助，在一定年限之内，让英国控制中国的行政，并使英国独享改组陆海军各机关、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的权利，而且还加开几个新的口岸，对英通商。李鸿章丧心病狂的卖国方案，正是英帝国主义求之不得的。但是老奸巨猾的英国，考虑到如接受这个方案，就难于对付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错综复杂、日益尖锐的矛盾，又加英国这时在远东的政策，已转向“联日防俄”。因此，欧格讷反而劝李鸿章在割地赔款的基础上，接受日本的条件，迅速结束战争。

李鸿章又向美、俄、德公使求援，同样没有结果。李鸿章曾数次访问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要求美国帮助。但是，这位自命为“中国老友”的田贝，在谈话中却直接拒绝了李鸿章的要求，要他“彻底抛弃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面向日本”。田贝的态度是明确地支持日本的勒索，同时要由美国一手包办和议。

田贝还告诉李鸿章说，中国除了割地之外，要准备大量赔款。并告诫李鸿章，不能采取增加税收、加重人民负担的办法，来支付赔款，因为这样做会引起人民革命。他建议清朝政

府，在战后可用筑铁路、开矿山、办银行等办法，来增加收入，解决支付赔款的困难。特别指出，为了执行这套“新政”，可以依赖“说英语的人”去办，不难从美国找到合适的“人才”。在这里，美国欲乘清朝政府战败之机，为美国资本侵入中国开辟道路的丑恶嘴脸，已经完全暴露。

田贝不仅支持日本进行勒索，还千方百计地解除李鸿章的顾虑，怂恿他充当出卖中国人民权益的全权议和大臣。这一点，田贝曾有明白的招供。他说：“中国方面都知道日本希望派李鸿章任使臣，这主要是因为他在政府里有大的势力，……不幸，李氏现在正处窘境。由于中国遭受惨败，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皇帝下谕夺去他的三眼花翎（音灵 líng）及黄马褂。他不愿去日本，他很害怕遭到暗杀。我曾严肃地和他辩论，来引导他接受所给他的荣誉。他对失掉花翎很觉痛楚。这个装饰品是戴在帽子上的，插在帽缘后面为它预备的孔里，帽子上面没有它，就好象一只公鸡失掉尾巴一样。我向他说，中国不可能派一位被羞辱的人去日本，因此，他的荣誉是能够恢复的。这一个引诱，再加上一个高尚得多的引诱，即他可以为国家效劳，使他同意担任这个危险的工作。”

李鸿章也曾找过沙俄公使喀西尼，和德国公使绅珂，作了长时间的谈判，希望沙俄和德国能出面阻止日本的割地要求。可是同样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沙俄所关心的，只是日本是否侵占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当时日本媾和的条件还未公布，沙俄政府在未知这些条件的确切内容之前，不愿意进行干

涉，以免把日本推向英国一边。

至于德国，这时正在积极进行趁火打劫的准备。德国帝国主义最感兴趣的是，想在中国沿海夺取一个据点，作为海军基地和商港。早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间，日军进攻中国东北的时候，德皇威廉二世在给首相何伦洛熙的电报中就指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德国都不要落在别国的后面，要及时在中国沿海占领一个据点。当时德国统治集团中，曾对究竟占领中国沿海哪一处地方，进行了讨论。威廉主张占领台湾，驻华公使绅珂则建议占领山东半岛的胶州湾，外交大臣马沙尔则主张占领舟山群岛。但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进行争夺的形势下，德国要占领中国任何一个海港，都不是没有困难的。德国政府的打算是，等待形势发展，趁机而动。当时日本的媾和条件还在严守秘密，其他列强也都还没有明确的表示，因此，德国当时也不愿出来进行干涉。

由于当时在帝国主义列强中，美国公开支持日本，英国准备联合日本对付沙俄，俄、德两国又各有打算，不愿在日本公布其议和条件之前，有所行动。这样，李鸿章那套“以夷制夷”的外交活动，也就必然落空。

所谓“以夷制夷”，既已绝望，而议和又势在必行，李鸿章为了不承担割地的责任，表面上表示不赞成割地，但又说不割地不能求和，要清廷给予割让土地的权力。这时西太后与光绪帝互相推诿，但由于三月初清军在辽东的全面溃败，形势危迫，又害怕春季海河解冻，日军分兵进犯天津、北京，因此最后决定授予李鸿章以割让土地之权。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四日，李鸿章带着随员一百多人，和美国顾问科士达，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议和。日本政府仍以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相陆奥宗光为全权代表，也拉上一个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端迪臣为顾问。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在日本马关春帆楼，双方交换了全权证书，开始谈判。

谈判是在美、日勾结下进行的，充当顾问的两个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串演了一出双簧戏。表面上各为一方，互相辩论，实际上串通一气，忠实执行美国政府帮助日本、讹诈中国的政策。在谈判中，科士达象他自己以后供认的那样，“并不希望中国有任何成功”，而端迪臣却卖力地为日本起草和约草稿，索地索款。

从谈判开始，日本始终贯串这样一个意图：为了防止国际干涉，必须压迫清朝政府迅速接受日本的条件，造成既成事实。因此，它一方面尽可能延迟宣露议和条款，另一方面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以配合谈判桌上的威胁、恫吓。所以当第一次谈判，李鸿章要求先议停战协定时，日本即提出极其苛刻的停战条件，故意刁难。这些条件是：一、日本军队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及当地城垒；二、上列各地的中国军队，须将一切军器、军需品交与日本军队；三、日军管理天津、山海关的铁路；四、休战期内中国负担日本的军事费用。双方就停战条件进行了第二、第三两次会谈，毫无结果，李鸿章被迫撤回了先议停战的要求。二十四日，第三次谈判结束，李鸿章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行刺负伤。这事发生后，伊藤、陆奥恐怕因此招致列强干涉。为了缓和国际舆论，

日本在三月三十日与中国签订为期二十一天的休战协定。接着，开始和约条款的谈判。

四月一日，日本政府提出苛刻的条约方案十款，内容包括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奉天南部、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三万万两；开放包括北京在内的口岸七处，及其他工商业的特权等。五日，李鸿章对日本提案进行答复，除承认朝鲜为日本控制外，对割地、赔款、修改商约等项，作了些申辩。十日，李鸿章与伊藤进行第四次谈判，伊藤除将赔款由原来三万万两减为二万万两外，其余各款基本照旧，并说他们提出的条款，“实为尽头”，中国只有答应或不答应之一词。同时，又大大恫吓，说如果谈判破裂，“中国全权大臣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日本侵略者样子好象很凶，其实不过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当时它已经捉襟见肘，精疲力尽。陆奥自己就供认：“去年以来长期连续战斗的军舰人员已经疲劳，军需也告缺乏”，“国内海陆军备都已空虚”。侵入中国境内的日本侵略军，不断遭到中国人民打击，日子并不好过。日本侵略者张牙舞爪，只不过是吓唬李鸿章这样的卖国贼罢了。

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与李鸿章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充分暴露出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丑恶嘴脸。例如，当日本强迫割让中国神圣领土台湾省时，伊藤博文限令清朝政府在一个月內办完交割手续。李鸿章说，“头绪纷烦，两个月才比较宽裕。台湾已是日本口中之物，何必着急？”伊藤回答说：“还没有咽下去，饿得厉害！”短短几句对话，帝国主义分子的贪婪（音兰 lán），

帝国主义走狗甘心卖国投降的可耻形象，暴露得何等淋漓尽致！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马关春帆楼与日本签订了空前屈辱的卖国条约——《中日马关条约》，条约的要点如下：

一、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

三、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分八次在七年内交清。第一次赔款交清后，余款每年加每百元抽五元的“利息”；但如能在三年内将二万万两全数交清，则可免抽“利息”。

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得驶入上述各口岸。

五、日本臣民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得自由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各项机器，仅纳入口税，得自由装运入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并享受在内地设栈寄存的优待。

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本军队暂时占领威海卫。

《马关条约》是日本侵略者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副沉重枷锁。它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过程中，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步骤。根据《马关条约》，中国割让了大片领土，这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且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引起帝国主

义妄图瓜分中国的狂潮。《马关条约》规定的赔款数目，是空前巨大的。清朝政府当时每年收入只有白银八千万两，而赔款接近此数的三倍。清朝政府为了免付“利息”，必须在三年内筹足此数，但是在人民已经十分贫困的情况下，要想在三年内搜括这样庞大的款项，是不可能的。这就给了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向清朝政府进行侵略性政治贷款的机会。甲午战争后不到五年里，清朝政府总计借外债三亿七千万两。而这以前自一八六五年到一八九四年的三十年里，所借外债共计四千余万两。帝国主义通过这些贷款，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长期吸吮中国人民的血汗，使中国人民更加坠入苦难的深渊。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列举帝国主义列强使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所采用的各种手段时，指出：“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①《马关条约》是第一个允许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原料，榨取中国劳动人民的不平等条约。甲午战争之前，外国资本在中国境内开设的工厂虽已出现，但是当时并无条约根据。《马关条约》后，帝国主义列强援引“最惠国”条款，享有“利益均沾”的特权，也取得了同样的权利。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从此“合法化”了。这完全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向中国输出资本，进行侵略的要求。条约签订后不久，英、美、德等国，就争先恐后来中国开设工厂。从此，帝国主义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二页。

就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榨取到远远超过在它本国设厂所能榨取到的超额利润，而且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业，直接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马关条约》使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日本由于从中国掠得了大片的领土、广阔的市场和巨额的赔款，迅速地进入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之一。日本的行动，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马关条约》签订后，立即爆发了俄、德、法三国干涉交还辽东事件；接着又出现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投资，夺取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激烈争斗，使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

十、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

《马关条约》签字的前夕，俄、德、法三国已在酝酿干涉日本对辽东半岛的割占。四月十七日《马关条约》签字这一天，沙俄政府正式邀请德、法两国，联合要求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如果日本拒绝，即由三国海军对日本采取行动。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字后的第六天，俄、德、法三国驻日本公使，各根据本国政府的训令，采取一致行动，警告日本退还辽东，并限十五天内答复。

在三国向日本提出警告的同时，俄、德、法三国的军舰，纷纷出现于日本附近海面。停泊在日本各港的沙俄军舰昼夜升火，禁止船员登陆；俄国东部西伯利亚总督统领下的沙俄军队，处于战备状态，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三国干涉还辽的策划者，是沙皇俄国。甲午战争前，沙俄就非常注意日本在朝鲜的扩张。战争爆发后，它为了将来行动的自由，采取了既不干涉，又不作中立声明的办法，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一八九四年末，清军节节败退，清朝政府开始向日本求和时，一些沙俄报刊曾公开鼓吹俄国应抢先占领中国东北，以便“不致使满洲成为日本的猎取品”。一八九五年

二月一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增加沙俄在太平洋的军舰，以应付事变的发展。马关议和开始时，沙俄即暗示日本不得侵占中国的东北。只是由于沙俄与英国在远东存在尖锐的矛盾，沙俄不愿意把日本推向英国一边，同时又不知道日本媾和条件的确切内容，才没有下强硬干涉的决心。

沙俄得知日本要求割占辽东半岛后，就日益趋向实行强硬干涉。因为在沙俄统治集团看来，日本侵占辽东半岛，是抢先占领了它准备侵吞的地方。它认为辽东的占领，势必导致日本对朝鲜的吞并，影响到它在太平洋的霸权。因此，沙俄统治集团在经过反复激烈的辩论后，决定不惜一战，强迫日本退还辽东。

德国是沙俄的积极支持者。德国当时已成为后起的工业大国，它正在千方百计向远东伸张侵略势力。它在远东的政策，主要目标是想在中国占领一个海港，作为进一步从事殖民扩张的据点。三月十九日李鸿章到达马关这一天，德国首相何伦洛熙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上奏中，就说：“肯定的，在中国海岸线上取得足供我们舰队与商业根据地的土地，我们当考虑为头等地位的利益。我们需要这些根据地，数十年以来已经有人鼓吹与主张。”德国帝国主义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少直接有关的国家，通过这样的要求，来作瓜分中华帝国第一个信号，不可能是德国的事”。急不可待地想在中国沿海夺取一个据点，而又觉得不能第一个动手的德国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侵略野心，便试图同英、俄两国勾结起来，一起动手。三月二十三日，德国驻俄大使向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表示，

德、俄两国在远东利益并不矛盾，希望合作。德国帝国主义认为，勾结沙俄共同行动，一则可以“从心怀感激的中国”取得“报酬”，“得到一块地方作为海军基地和煤站之用”；再则“可以把俄国的视线转移到东方来”，借以减轻帝国主义列强在欧洲争霸过程中，俄、法同盟在欧洲对德国的压力。德国的这一番打算，在德皇威廉二世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给俄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中，有明白的招供。他说：“我尽我一切权力，使欧洲维持安定，保卫俄罗斯的后方，使谁都不能阻碍您在远东的行动。……我关怀地期待我们的事业更进一步发展，并希望因为我欣然赞助您解决可能合并于俄国的领土问题，所以您也应善意地对待德意志争取不‘妨碍’您的某地港口的行动。”

法国在联合对日本进行干涉的问题上，基本上以沙俄的立场为转移。法国是沙俄的同盟国，它参加联合干涉，既表示对盟国的支持，也借此取得清朝政府对它的感激，以便将来向中国勒索“报酬”。

在帝国主义列强酝酿联合干涉的过程中，俄、德、法三国都曾企图拉拢英国参加，但英国始终拒绝。因为在英国统治集团看来，日本在马关谈判中所提出有关商务条款的要求，对于可以利用“最惠国”的特权同样享受的英国来说，极为有利。而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将威胁沙俄，并不损害英国，因为英国的利益主要集中在上海附近。英国的外交大臣金姆勃雷竟说，中国的首都如因辽东半岛的割让失去屏障，则不妨迁往南京。英国帝国主义所打的算盘，是通过日本对中国的勒索，它既

可以分享商业利益，又可利用日本占领辽东对抗沙俄，并怂恿清朝政府把首都搬到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便于它牢牢地加以控制。英国虽然拒绝参加，但并不能改变俄、德、法的行动。

三国的联合干涉，给日本以很大压力。这时日本“国内海陆军备不仅几成空虚，而且从去年以来经过长期战斗的舰队以及人员、军需，均告疲劳缺乏。现在不仅对三国联合的海军无力应付，即单独对抗俄国舰队也无把握”。日本政府感到要断然拒绝三国干涉，实不可能，便确定了“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不完全让步，但对中国则一步不让”的方针。同时，采取积极的外交手段，力促其他强国出面牵制俄、德、法三国。主要是企图怂恿英、美两国，出来进行反干涉。

日本通知英国说：“由于此次俄国之干涉，已完全可以推测俄国对满洲东北部及朝鲜北部包藏的野心，日本政府认为，关于此事英国具有与欧洲其他各国不同之利害关系”，希望英国出来反干涉。同时，秘密要求美国政府向沙俄进行劝告，以免因三国干涉，致使清朝政府拒绝批准《马关条约》。但是，当时英国虽然拒绝与俄、德、法联合干涉，却也不愿意替日本效劳。它以“英国对日本虽抱友情，而俄、德、法亦系友邦”的外交辞令，婉言谢绝。美国对日本的答复是，愿“承诺于局外中立不相矛盾的范围内，与日本协力；而媾和条约批准之事，已电令驻北京美国公使劝告中国从速实行”。这就是说，美国虽不能对俄、德、法三国进行反干涉，但却可以协助日本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迅速批准《马关条约》，保证日本在条约中已掠得的侵略利益。

日本对英、美的期待既已落空，迫不得已于四月三十日，电令驻欧洲各国公使分别通知俄、德、法三国，表示愿意在中国给予适当“赔偿”的条件下，只占金州（包括南端的旅顺），而放弃对辽东半岛其他部分的永久占领。俄、德、法三国认为日本的答复不能满意，坚持必须全部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这时日本感到单凭外交上的折冲，已不起什么作用，而且“此种形势如继续发展，使外交上两个未决的问题（指三国干涉还辽与《马关条约》的批准）日趋复杂，终将招致逐二兔者不得一兔之虞”。因此，它决定实行对“俄、德、法三国完全让步，但对中国一步不让”的政策，于五月五日向三国表示完全接受劝告，放弃对整个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但对中国则一点不放松，坚持按原订条约批准，迅速交换批准书。同时借退还辽东半岛，向清朝政府勒索所谓“偿金”。后来，在俄、德、法的支持下，终于向清朝政府勒索了三千万两“偿金”了事。

三国干涉还辽，引起了清朝统治集团很大的幻想。他们有的希望各国干涉交还台湾；有的主张不批准条约，并严厉谴责李鸿章。卖国贼李鸿章则躲在天津总督衙门，不去北京。这时美国为了协助日本实现《马关条约》中勒索的侵略利益，便训令驻华公使田贝，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催促它“从速”批准条约。科士达则更加露骨地为美、日的侵略利益效劳。他代替李鸿章到北京，用欺骗和恐吓的手段，促使清廷批准《马关条约》。科士达在他的《外交回忆录》中说，他到北京后即致书总理衙门，“请求同军机处举行关于皇帝批准条约的会议”。四月三十日，科士达参加了军机大臣会议。“会议的目的，是

要使军机大臣深知皇帝批准条约之必要。我(科士达)强调之点是:条约已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因为在签字之前,每一个字都电达北京,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假如他拒绝批准的话,那在文明世界之前,他将失掉了体面,对于皇帝的不体面,军机大臣是应负责任的。”科士达的话产生了效果,五月二日光绪帝在御前会议上,决定批准《马关条约》。当科士达从北京回到天津时,卖国贼李鸿章出门迎接,科士达赶快告诉他“皇帝已批准”了条约。科士达后来说:“我同军机处会议的情形,他(李鸿章)全知道,并且完全归功于我,并说假若我没去北京,那么条约就完了。”从科士达这段自供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在中、日议和过程中,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

《马关条约》批准后,清朝政府还想推迟换约时间,看看沙俄是否能对日本使用武力。可是,五月五日日本宣布接受三国要求后,沙俄的目的已达。原先劝清朝政府暂缓批准《马关条约》,借以加强对日本施加压力的沙皇俄国,却转过来催促清朝政府,按期履行换约手续。清朝统治者指望沙俄再为自己出力的幻想破灭了。五月八日,清朝政府的代表,在烟台与日本代表完成了换约手续。

《马关条约》虽然换约,但条约上关于“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交接清楚”的规定,却由于台湾人民武装起义反对割让,难以兑现。可耻的清朝统治者,为了如期向日本侵略者交割台湾,于五月二十日命令台湾巡抚唐景崧(音松 sōng),率

文武官员撤出台湾。同时，又特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为“割台大臣”，而科士达则协助他完成这一卖国勾当。人民武装控制着台湾，李经方不敢也不可能登陆办理“移交”台湾的手续。当时，日本侵略者本打算要李经方退到福州一带港口，等待日本侵略军把台湾人民的抵抗镇压下去后，再行办理。这势必要使“移交”无限期延迟。这时，科士达便又一次跳出来“献策”，向李经方提出，可以用一个书面文件来完成割台手续，而不必上岸。李经方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六月二日，在取得进攻台湾的日本侵略军头子桦山同意后，在基隆港外的日本军舰上，办理了出卖台湾的“移交”手续。

卖国贼虽然在一日之间办完了出卖台湾的手续，但是，中国人民却从没有承认过。台湾人民用英勇的武装反抗，来回答这一可耻的出卖。

十一、中国人民反对割让 台湾的斗争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界群情激愤，纷纷谴责清朝政府的卖国罪行，对卖国贼李鸿章恨之入骨。在人民的咒骂声中，李鸿章由日本回国后，称病不敢见人。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用诗歌等文艺形式，表达了对割让领土的愤慨。这年正遇着全国会试，康有为联合全国各省来北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书光绪帝，要求清朝政府不批准卖国的《马关条约》，迁都抗战。台湾籍举人上书都察院，强烈抗议清朝政府“弃地界（音必 bǐ）仇”，表示台湾人民“如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台地军民必能舍生忘死”，为反抗日本侵略者侵占台湾奋战到底。反映了全国人民反对清朝政府卖国投降的爱国情绪。上海出版的《申报》，发出“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的呼声，明确指出了人民抵抗路线和统治集团投降路线的本质区别。余栋臣领导下的四川农民起义军，在听到签约的消息后，立刻发布檄（音习 xī）文，传告天下，反对割台，反对赔款，表示要兴师讨伐外国侵略者，

表达了广大农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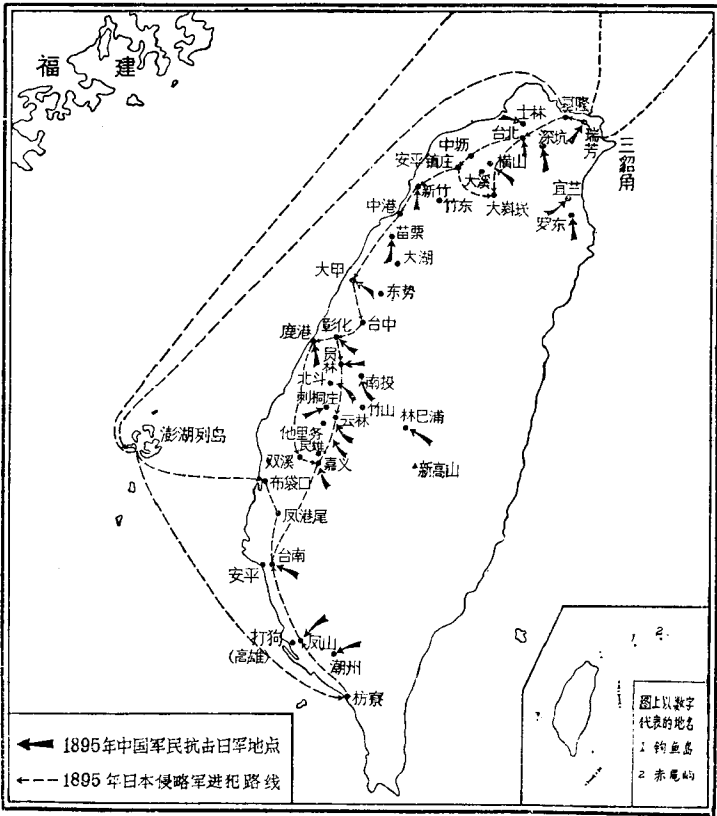
割地消息传到台湾，犹如晴天霹雳，全省人民奔走相告，表现了极大的悲愤。《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台北就鸣锣罢市，人民群众愤慨地拥进台湾巡抚衙门，抗议示威。台湾各阶层人民联名致电清朝政府说：台湾人民“誓死守御”，“义与存亡”。他们并发出檄文，痛斥李鸿章说：“我台民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身家性命，非丧于倭奴之手，实丧于贼臣李鸿章之手也。”声称台湾人民愿“为国家除贼臣而死”，只要碰到李鸿章等卖国贼，就要把他们杀死，以谢天地祖宗，表达了台湾人民对清朝政府卖国行径的强烈抗议。

五月二十七日，日军主力近卫师团从冲绳中城湾出发，乘大批船舰，分两路进攻台湾。五月二十九日，一路日军在三貂（音刁 diāo）角登陆；六月一日，另一路日军攻占基隆。在日本侵略者的重兵进攻面前，曾经扬言要守卫台湾的台湾巡抚唐景崧，和当地的一些地主豪绅，仓皇内渡逃命，把大量武器军火都丢下了，使日军得于六月七日迅速入侵台北。但是，日本侵略者遭到台湾人民和爱国官兵英勇不屈的抵抗。

唐景崧逃跑后，台湾人民纷纷组织义军，共同推举当时驻防台湾的刘永福为首领，领导抗日，决心实现“万众一心，誓同死守”的钢铁誓言。

台湾抗日义军，较大的有七、八支，各有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其中最杰出的是徐骧（音香 xiāng）和吴汤兴。徐骧是苗栗县爱国知识分子，他号召台湾同胞起来进行武装抵抗，要在生死存亡关头，“人自为战，家自为守”，保卫祖国的领土，保卫

自己的家乡。在他的鼓动和组织下，很快组成一支抗日义军，影响所及，其他地方也纷起组织同样的义军。这些义军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显示出非凡的英雄气概，成为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主要力量。



台湾人民反抗日军侵略形势图

日本侵略军占领台北后，不断派遣海军骚扰台南、凤山各地，陆军主力则自台北沿西部平原南犯。那时刘永福率军防守台南，北部防务主要依靠当地义军。

悲壮的台湾保卫战，于六月中旬开始。

日本侵略军于六月十二日分两路开始进攻新竹。守新竹的是知县王国瑞和吴汤兴、姜绍祖等率领的义军，激战六日，两度击退敌人。王国瑞胆怯逃跑，姜绍祖力战不屈，最后壮烈牺牲，新竹沦陷。六月下旬，日军继续南犯。徐骧等义军英勇阻击，三次打败敌人，迫使敌军退回新竹。

新竹为台中的入口处，是战略要地，义军决定反攻新竹。徐骧等联合从台北退下来的两营军队，包围新竹，决定于七月十日同时出击。当义军进攻时，日军疯狂抵抗，在新竹城外三里的十八尖山上，展开激烈的攻防战。日军用大炮轰击，义军则肉搏冲锋，来回争夺。最后，因日本侵略军炮火占优势，义军被迫撤退。综计新竹争夺战大小二十余次，坚持一个多月，给了侵略者很大打击，表现了义军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

新竹失守后，义军退守大甲溪、台中、彰化一带。刘永福派青年将领吴彭年，率领军队两营前来增援。徐骧和吴彭年决定采用伏击战。八月二十二日，日军南下进犯大甲溪，刚刚渡过溪岸时，埋伏在大甲溪南岸丛林中的吴彭年伏军，突然出击，日军大败，溃退北渡。日军的溃兵才渡过一半，徐骧率领的第二支伏兵又突然从岸边丛林中横腰杀来，杀声震天，日军闻声丧胆，纷纷落水，死亡无数。这次伏击战，给予来犯的日军以沉重打击。八月二十三日，日军攻陷大甲溪。



一八九五年台湾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

接着，日军又进犯台中。台中人民一千余人，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抵抗。一个年轻的农民隐蔽在大树上，用准确的枪法，击毙日本侵略军二十余人。这时知县忠满，奉命带兵四营赴援，但他是个怕死鬼，畏缩不前。八月二十六日，日军攻占台中。

日军继续进犯，徐骧、吴彭年等率领军队退守彰化。八月二十八日，双方在彰化东门外八卦山，展开激烈战斗。这是日军侵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肉搏战，英勇的义军不怕牺牲，艰苦战斗，杀得日军主力师团嚎叫逃窜，死尸摆满山岗。日军收买汉奸，由小路抄袭山顶，包围义军。义军拚死抵抗，吴汤兴

中炮牺牲。林鸿贵率军百余人冲锋，相继殉难。吴彭年指挥三百多战士，奋勇争夺山顶高地，最后吴彭年和大部分战士英勇战死。徐骧率领余部，冲锋肉搏，突出重围，退往台南。日军攻入彰化城。

在这场悲壮的血战中，义军给了日军最精锐的部队——日皇近卫师团一千余人，以沉重打击。综计台中、彰化之役，坚持一个多月，大小数十战，迫使侵略者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台中、彰化失陷后，刘永福急派王德标率军守嘉义城，杨泗洪带兵赴援前线，统率各军，反攻彰化。

八月三十日，杨泗洪带兵进攻日军，获得全胜，歼敌几百人。九月一日日军入侵云林，二日犯大莆（音葡 pú）林，杨泗洪等率军伏击，大败日军，杀敌数百人，克复大莆林，但杨泗洪也不幸战死。九月四日，刘永福部王德标，及义军黄荣邦、林义成等部数千人，攻克云林县城。六日，王德标所部及各路义军，包围了彰化。

台湾高山族人民也纷纷起来抗战，派遣七百健儿参加徐骧的义军。

义军连续反攻获胜，日军军官山根少将被击毙，日军龟缩彰化，反攻形势非常有利。但是这时义军的弹药已快消耗光了，卖国的清朝政府生怕得罪日本侵略者，对台湾人民的坚决抵抗怕得要死，不但不予支援，还一再下令严禁沿海各省官吏和人民支援，甚至对去台湾的船只，都严加搜查。清朝政府令人发指的行径，使台湾义军极难取得补充，无力攻克彰化。

日军近卫师团不断遭受台湾义军打击后，急忙从辽东增调第二、第四两个师团，由侵台副总督高岛丙之中将率领，于九月十一日到达台北，重组“南进军”，在海军配合下，分水陆两路大举进犯。

十月上旬，彰化日军得到增援，倾巢出动。当时义军粮弹已极为困难，但仍连日英勇奋战，死伤两千余人，日军侵占云林、大莆林。

十月十一日，日军大举进犯嘉义。防守嘉义的将领王德标，在城外营中埋下许多地雷，然后弃营进城。日军不战而得军营，夜半地雷爆炸，炸死七百多人。日军仓皇撤退，又被王德标伏兵截击，死伤很多。第二天，日军用大炮轰塌城墙，窜进城中，义军浴血巷战，逐街逐屋地争夺，杀伤日军无数。日军近卫师团师团长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在这次战役中受重伤，不久毙命。

日本侵略者用重大代价夺取了嘉义，接着就包围台南。

嘉义陷落后，日军第二师团，在台湾南部枋寮（音方辽 fāngliáo）和台南以北的布袋口登陆，配合攻占嘉义的近卫师团，夹攻台南。布袋口登陆的日军，与义军大战于曾文溪。义军首领徐骧阵亡。十月十一日，守军与枋寮登陆的日军接战失败。接着日军攻陷东港、凤山。十五日，日本海军攻占打狗（高雄）。随后，日军进攻台南。刘永福驻安平炮台，策应守城军。各军饿极不能战。十八日，守城军溃散。十九日，日军进攻炮台，刘永福经不起考验，抛弃了他所率领的抗日军队，偷偷地乘英国轮船逃往厦门。二十一日，台南陷落。

在日军侵占台湾的过程中，台湾军民以劣势装备，抗击日本侵略者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屡打胜仗。日本侵略者从台北南侵，为了攻占西海岸南北狭长七百多里的地带，经过五个月激烈战斗，死伤和因病中途被遣回的达三万二千多人。侵台主力的近卫师团，将近一半被消灭在台湾，担任师团长的亲王，也重伤毙命。台湾军民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台湾军民的辉煌战绩，和李鸿章之流所统领的数十万清军一败涂地的丑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日本侵略者在十月二十一日攻占台南后，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宣布台湾“平定”，但是等待他们的不是“平定”，而是长期的、持续的、遍布全省的反抗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①台湾各族人民对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残暴压迫和榨取，掀起了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的反抗斗争。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林大北围攻台湾东北的宜兰县。第二年一月，又有陈秋菊、胡阿锦等领导的抗日暴动，袭击台北。台北一带的深坑、士林、沪尾、枋桥、瑞芳、金包里、罗东、淡水等地，也都发生暴动，台北附近各地农民、手工业者、工人，群起响应，占领村庄，包围城镇，声势很大。

在台中，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规模更大。一八九六年五月，留台清军将领刘德杓率部进入云林山中，发布檄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六页。

文，号召台湾人民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六月，嘉义县大坪顶青年造纸工人柯铁，组织游击队，以猎枪袭击日军。柯铁精于枪法，有一次，柯铁一个人，使用十二杆枪（其中十三发枪一，七发枪三，余亦四、五发），利用熟悉山中途径的条件，在一处伏击之后，复转他处截击的战术，忽东忽西，枪无定处，“以一人独驱敌人五百余人”。柯铁在大坪顶建立根据地，号称“铁国山”，成为台湾中部抗日的中心势力。大坪山涧深路狭，竹林密布，形势险要。每当日军进犯，起义军利用有利地形，采用各种灵活机智的战术，巧妙地袭击敌人，打得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起义军屡次以少胜多，常常一举歼灭敌人数百名，使日军不敢深入。在柯铁的带动下，抗日火焰在台中一带普遍燃烧，简精华、黄国镇、陈发等纷起响应。起义人民扼守山谷，占领村庄，包围城镇，攻云林，克北斗，围嘉义，打得日本侵略者晕头转向。他们一面生产，一面战斗，在战斗中锻炼成为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坚持斗争达数年之久，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在台南，林少猫领导的抗日军活动于凤山、屏东、东港、潮州一带，和郑青、林天福、吴万兴等领导的抗日军互通声气，随时随地打击敌人，使日本侵略者处于到处挨打的困境。一八九八年底，林少猫联合三千多人，袭击日本侵略者在潮州的统治机构，台南的日军竟因此逃避。

一八九九年，在台北一带又爆发了简大狮领导的武装抗日斗争。一九〇一年二月，詹阿瑞率领民众对台中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十一月，黄茂松又发动对朴仔脚日本办务署的

攻击。


上述全台性的英勇反抗，前后八年，迫使日本侵略者手忙脚乱，难于应付。在当时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首领中，台北简大狮、台中柯铁、台南林少猫最为有名，被人民称为“三猛”，深受人民爱戴。柯铁由于勇猛机智，更被人民呼之为“柯铁虎”。

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虽然遭到日本侵略者血腥镇压，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被日本侵略者所吓倒、征服。他们“剿杀则不惧，招降则不信”，坚持不懈地反抗日本侵略者。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度过了五十年，也用各种方式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了五十年。

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者的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是极为光辉的一页。台湾人民的英勇斗争，表明了任何外来侵略势力，妄图霸占并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野心，是绝对不能得逞的。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今天，还窃据着台湾的蒋介石等一小撮民族败类，已处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他们的寿命不长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省！

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本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地要求扩大国外商品市场；构成日本军部和政府核心的藩阀势力，要求发动一场侵华战争，实现他们扩张领土的野心，是日本侵略者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

这次战争，仅就海陆军的实力来说，中国并不比日本差，中国是处在有利的战略地位上。中国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



2 037 8622 4

战争，全国人民都支持这次战争。然而战争却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朝政府，是一个政治上与军事上极端腐朽的卖国政府，人民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因此，在战争过程中，尽管有部分爱国军队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包括台湾人民那样大规模的抵抗，但终不能改变整个战争失败的结局。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此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以资本输出为主的阶段，中国更加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乘机掀起妄图瓜分中国的狂潮，出现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特别尖锐的局面。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和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